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外債對國家發動衝突的影響（1970-2014 年）

The Impact of External Debt on States' Initiation of Conflict

(1970-2014)

許勝惟

Sheng-Wei Hsu

指導教授：廖小娟 博士

Advisor: Hsiao-chuan Liao, Ph.D.

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May, 2022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外債對國家發動衝突的影響 ( 1970-2014 )

**The Impact of External Debt on States' Initiation of  
Conflict (1970-2014)**

本論文係 許勝惟 君 ( 學號 : R08322026 ) 在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11 年 5 月 13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許勝惟

( 簽名 )

( 指導教授 )

張文揚

張玟健



## 謝辭

現在撰寫謝辭，對我來說我覺得言之過早，可能是因為我的人生階段尚未好好告一段落，才會有此疙瘩的感覺，但還是先寫個輪廓，直到人生目標完成，再將此段話好好地交代清楚。

大學重考的我仍無法如願以償的進入國關的大家庭，不過在研究所給我了一個機會，能好好鑽研國關的樂趣。我依稀記得當初收到政研所的錄取通知的雀躍感，讓我在研究所時期能夠自我實現對國關的興趣。在研究所時期遇到許多好同學、好朋友，這些好朋友是在同一艘名為學術之船打拚的好夥伴，是一起出去玩、分享心事的好同儕，是一起參加學術研討會、一起討論文獻的好同學。從最早的 618，待了一學期的 625，以及待了足足兩年成為第二個家的 619，研究所時期真的是一段很快樂與充實的一段重要人生。

首先，我想將這篇論文獻給我自己，因為我對國關的興趣與堅持，讓我得以進入台大做我想做的事，不敢說是鑽研，卻是在衝突與國關研究領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度過一段不後悔的碩士教育。

再來，在研究所時期，需要感謝的人太多。我想感謝我的父母，不反對我念研究所，而是支持我追逐我的夢想。我要感謝念維學長，幫助我順利進入台大大家庭，也在人生道路上給我鼓勵；我 108 級的國關朋友們鎮宇、涵雯、昭遠、中山、Sheep、靜雅、祥亭等，不知凡幾的如 Benjamin 等其他政研所朋友，619 的同學們智恩、俊丞、勝凱、Koki、Dorota 等，陪我渡過美好的過程，不論是一起出去玩抑或是在研究室煮湯圓、煮火鍋、慶祝生日、露營；在量化分析上，感謝辰諭學長與昀曄，沒有你們的建議，我可能無法順利完成論文；感謝我的指導老師小娟，不厭其煩地與我討論不成熟的題目，鉅細彌遺地修正我的論文最終完成這篇滿意的論文；感謝珈健、文揚老師兩名口委給了我許多建議。最後感謝我的女朋友智恩，在研究所時期陪伴我，給了我依託的地方，帶給我幸福的每一刻，走慢了我的時間，期待未來我們都能好好的完成各自的目標。

最後，我相信碩士的學術生涯並不是終點，可能是另一段旅程的起點，未來會不會持續進行學術活動呢，不一定，拭目以待嘍。



## 摘要

一般認為一國若要發動對外衝突，需要充足的資金與資源，然而當國家身負重債時，則難有能力執行這種策略。而在研究外債和國家對外衝突行為關聯的文獻中，多是從概念討論其關聯，但未輔以經驗事實驗證；或是進行實證研究分析，但卻未能闡明清楚債務與衝突之間的機制，以及債務國與債權國之間的互動過程。

為釐清外債對一國的影響，以及債務國與債權國之間的互動關係，以便理解外債問題與對外發動衝突的相關性，本研究提出債務衝突假說，從債務國的角度出發，解釋外債與衝突之間的運作機制：當一國負擔過多外債，面臨的不僅只有還債的壓力，還可能成為債權國影響內政的工具，因此對該債務國來說，發動衝突帶來的效益可能比持續背債還多，也就是國家會透過衝突帶來的結果，向債權國或國際金融組織釋放訊號，增加自身在債務談判桌上的槓桿，得到債務融資或是債務減免等緩解外債問題的解方。對於這些身負重債的債務國而言，對外衝突的目的是為了提供在欠債的弱勢情況下翻盤的機會。因此，本研究假設當一國外債越大時，該國將會更偏向採取發動衝突、乃至於戰爭的行為，且軍事衝突規模也會隨之增加。

透過對 192 個國家從 1970 至 2014 年共 45 年的實證分析，統計結果顯示：外債負擔大小確實對發動衝突有正向的影響，亦即：外債的負擔越重，會增加越多衝突發生的機會。對於戰爭發動則沒有統計上的顯著關係。而國家對外債的負擔越重，對外衝突的規模也就越大。另外，中低收入的國家的外債數量大小對發動衝突有正向的影響，且在衝突發生的邊際效果上比全體國家更大。可以見得外債負擔確實有可能成為國家發動對外衝突的觸因。

關鍵字：外債、債務清償談判、軍事衝突、戰爭、衝突規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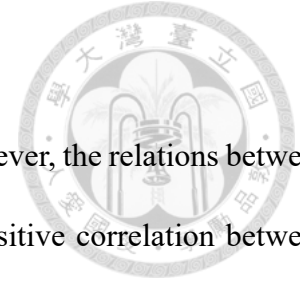


# Abstract

Initiating conflict as a diplomatic strategy relies on a country having sufficient resources and funds in general. It is hard for a heavily indebted country to implement this kind of strategy. However, the existing research either focus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ncepts without empirical evidence, or examine empirical tests but lack of explanation of the mechanism between debt and conflict, nor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between the debtor and creditor countries.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mechanism between external debt and conflict in indebted countries by clarifying the impact of external debt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ebtor and creditor countries. By proposing debt conflict hypothe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btor country, this thesis explains the mechanism between external debt and conflict. Specifically, debtor countries have to confront not only debt obligations, but also subsequent political pressures arising from heavy debt, which is likely to lead the debtor countries to initiate conflicts in order to deliver a signal to their creditor o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the need for concessions on their debt issues. In other words, debtor countries are motivated to initiate conflicts because they believe conflicts can bring them benefits which outweigh the consequences that conflict might bring. Their goal is to increase leverage on debt negotiation for new finance and debt relief through conflict initiation. Hence, this thesis hypothesizes that the more debt a country has, it is more likely to initiate a conflict, and even a war. Also, as the heavier the debt is, the scale of conflict increases.

The proposition of these hypotheses is examined through an empirical study on 192 countries from 1970-2014.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s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xternal debt burden and conflict initiation. Namely, it is highly likely for a country to initiate a conflict as the debt burden



increases. Also, the heavier the debt is, the scale of conflict increases. However, the relations between debt and war initiation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addition,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debt amount and conflict initiation is also significant, especially for middle-income and low-income countries. The marginal effect of debt on conflict initiation of middle-income and low-income countries is bigger than that of all countries. In sum, debt burden indeed has impacts on countries' initiation of conflict .

Keywords: External Debt, Debt Settlement Negotiation, Military Conflict, War, Scale of Conflict

# 目錄



<b>第一章 緒論</b> .....	<b>1</b>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	5
<b>第二章 文獻回顧</b> .....	<b>7</b>
第一節 外債與國家 .....	7
第二節 外債對國家行為的影響 .....	17
第三節 小結 .....	24
<b>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假設</b> .....	<b>26</b>
第一節 公共債務、外債與內債 .....	26
第二節 理論基礎與模型 .....	28
第三節 研究對象與資料來源 .....	38
第四節 變項與測量 .....	39
第五節 分析方法 .....	44
<b>第四章 分析結果</b> .....	<b>46</b>
第一節 敘述統計分析 .....	46
第二節 迴歸結果分析 .....	49
第三節 小結 .....	68
<b>第五章 結論</b> .....	<b>70</b>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理論貢獻 .....	70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	73
參考文獻 .....	74



# 圖目次



圖 1 - 1 阿根廷外債的變化(1970-1984) .....	2
圖 1 - 2 阿根廷外債對 GDP 比率的變化(1970-1984) .....	2
圖 2 - 1 DEBT-LAFFER 曲線.....	13
圖 3 - 1 和平鴿子自身實力與好戰程度 .....	32
圖 3 - 2 債務衝突假說之機制 .....	37
圖 4 - 1 外債對 GDP 的比率對衝突發生的平均邊際效果 .....	53
圖 4 - 2 外債對出口的比率對衝突發生的平均邊際效果 .....	53
圖 4 - 3 外債對 GDP 比率對衝突發生的預測概率 .....	54
圖 4 - 4 外債對出口的比率對衝突發生的預測概率 .....	54
圖 4 - 5 外債數量對衝突發生的平均邊際效果（全體國家） .....	58
圖 4 - 6 外債數量對衝突發生的平均邊際效果（中等偏下與低收入國家） .....	58
圖 4 - 7 外債數量對衝突發生的預測概率（全體國家） .....	59
圖 4 - 8 外債數量對衝突發生的預測概率（中等偏下與低收入國家） .....	59
圖 4 - 9 「外債對 GDP 的比率」對各衝突規模的預測概率 .....	65
圖 4 - 10 「外債對 GDP 的比率」對各衝突規模的預測 .....	65
圖 4 - 11 「外債對出口的比率」對各衝突規模的預測 .....	66
圖 4 - 12 「外債對出口的比率」對各衝突規模的預測 .....	66
圖 4 - 13 「外債數量」對各衝突規模的預測 .....	67
圖 4 - 14 「外債數量」對各衝突規模的預測 .....	67

# 表目次



表 2-1 債務可持續性框架下的債務負擔閾值 .....	10
表 3-1 外債負擔對各項依變項的預期迴歸係數方向 .....	40
表 3-2 本研究各變項的操作定義與數據來源 .....	43
表 4-1 依變項—「衝突」的敘述統計分析 .....	47
表 4-2 依變項—「衝突規模」的敘述統計分析 .....	47
表 4-3 各項解釋變項的敘述統計分析 .....	48
表 4-4 外債對 GDP 的比率對衝突發生影響的迴歸估計結果 .....	51
表 4-5 外債對出口的比率對衝突發生影響的迴歸估計結果 .....	52
表 4-6 外債數量對衝突與戰爭發生影響的迴歸估計結果 .....	57
表 4-7 外債大小對衝突規模上升影響的迴歸估計結果 .....	63
表 4-8 外債大小對衝突規模上升影響的邊際效果 .....	64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國際債務」無法被順利清償，除了會引發全球性的債務危機，擾亂國際金融體系秩序，也會對違約國及其債權國造成嚴重的後果，像是 1980 年代的拉丁美洲債務危機與 2010 年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國家借債有利有弊，若是在可償還水準之下，能夠為國家提供資金，增加投資活水，幫助國家發展經濟與提升社會福利。然而若累積的債務超越償還能力時，則有可能會對國家造成一連串的後果，包含經濟惡化，缺乏足夠可用的財政工具(Panizza & Presbitero, 2014)，以及承擔若干國內外的政治壓力。

阿根廷在 1982 年債務危機爆發以前，都是以借債發展策略的進口替代來發展經濟(賴競民, 2008)，於 1970 年代已經累積大量外債，至 1982 年前的外債累積為 1970 年的 8 倍，外債負擔則多了 1.7 倍，見於圖 1 - 1、圖 1 - 2。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統計，阿根廷於 1980 年已經超越國際公認的償債能力警戒線(陳之芸, 2004)，這使阿根廷難以履行債務義務，瀕臨違約危機。1982 年 4 月，阿根廷向福克蘭群島(Falkland Island)進行軍事行動，開啟與英國的戰爭。學界普遍認為，阿根廷政府是為了轉移國內民眾對債務處理不當導致經濟惡化的不滿，才發動福克蘭戰爭(Levy & Vakili, 1992; Oakes, 2006; Gent,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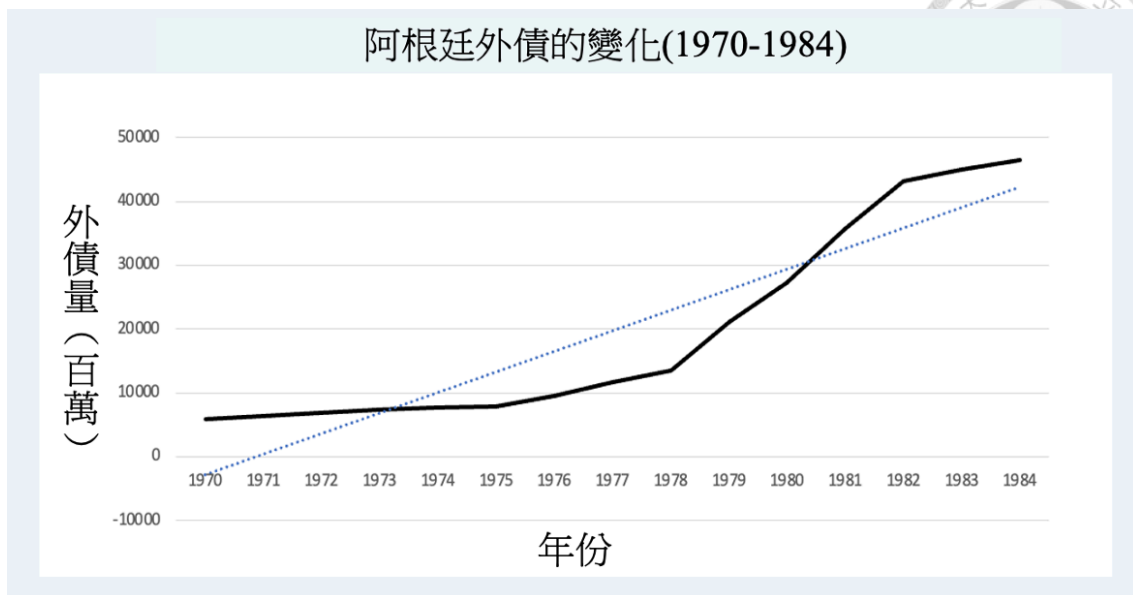


圖 1 - 1 阿根廷外債的變化(1970-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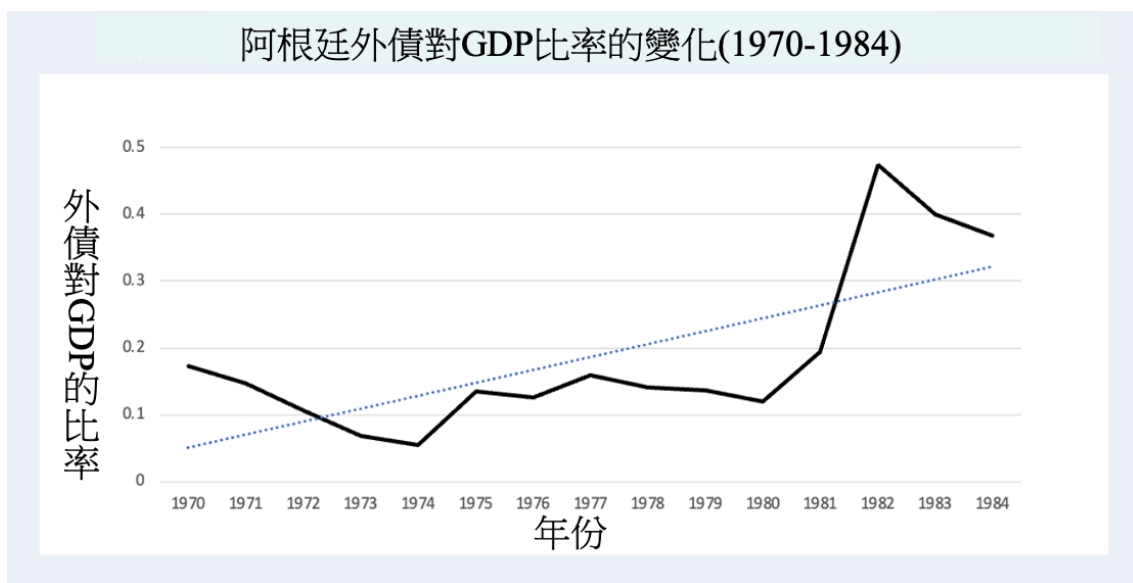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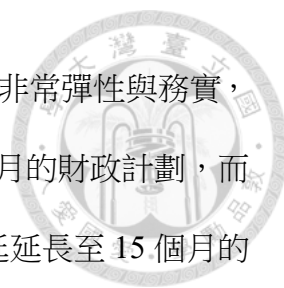


圖 1 - 2 阿根廷外債對 GDP 比率的變化(1970-1984)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經戰爭洗禮過後的阿根廷政府於 1982 年 9 月的 IMF 年會中，宣布無力支付債務，向 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oundation，後續以 IMF 代稱）要求提供備用貸款(Standby Loan)，以償還該年度的欠款。IMF 隨即派遣一個工作小組至阿根廷



商討相關貸款協議，研擬核准有條件的貸款予阿根廷，這些條件非常彈性與務實，包括阿根廷需將年度通貨膨脹率從 500%減少至 150%；制定每月的財政計劃，而非一般國家常用的季度計劃，以供 IMF 監管；IMF 並給予阿根廷延長至 15 個月的救助計劃等，如此可見，比起其他向 IMF 申請貸款的欠債國，阿根廷得到相對寬鬆的待遇(Stile, 1978:61-65)。而阿根廷之所以能夠與 IMF 達成這些協議，很可能是因為阿根廷的債主中有一大部分是美國銀行家，由於擔心阿根廷可能會倒債，影響他們的債權，於是施壓美國政府藉以影響美國在 IMF 中的立場(Schumacher, 1982);<sup>1</sup>而且阿根廷若在當時違約，會造成世界金融立即性的危機，因此 IMF 設法在債務國與債權人之間扮演緩衝角色(De la Cruz, 1988:654)。IMF 願意在福克蘭群島戰爭後提供阿根廷較為優惠的條件，似乎與學界另一種「和平鴿」的假設相符合，也就是一無所有的和平鴿國家反而有可能奮力一搏，求取更多的談判籌碼。不免讓人懷疑阿根廷發動衝突的真實意圖，究竟是要轉移國內注意力？<sup>2</sup>或是藉由對外衝突，迫使他們的債權國或是 IMF 給予相關債務讓步？

具體而言，學界在討論國家間衝突與戰爭的起源存在許多解釋，大致可分成國際結構層次與國內層次，而國內層次的因素中，經濟層面的影響亦相當重要，其中「外部債務」的可能性卻很少被直接作為衝突原因。外債除了會影響國家的經濟表現外，有沒有可能直接成為國家間衝突的導火線？換句話說，外債有沒有可能才是真正影響國家決定發動或提高軍事衝突程度的主因？

---

<sup>1</sup> 美國同時是 IMF 中握有最多投票份額的國家，在 IMF 中的決策佔有決定性地位，2022 年美國擁有佔全體 16.5%的投票份額，比次多的日本(6.14%)高出超過 10%的投票份額(IMF, 2022)。

<sup>2</sup> 傳統轉移注意力戰爭理論(Diversionsary theory of War)認為，國家領導人可能會因為國內經濟衰退產生民怨後，藉由製造外交上的衝突或戰爭，轉移國內人民的注意力(Blainey,1988; Tarar, 2006; Oakes,2012)。但 Tir(2010)卻發現經濟的負成長並非是國家發動轉移注意力戰爭的關鍵，領導人受歡迎的程度才是會造成國家發動轉移注意力戰爭的因素。



在過去的經驗中，除了阿根廷外，伊拉克也曾經因為「外債問題」而與外國發生軍事衝突。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耗時兩天併吞科威特，伊拉克軍事行動的目的不僅僅是覬覦科威特豐富的油田與波斯灣出海口，也希望透過衝突解決繁重的外債問題。時任伊拉克領袖海珊希望重振兩伊戰爭後的經濟，藉以維護其政權的合法性，於是要求科威特免除其在兩伊戰爭時向科威特借的 140 億美元外債，以及要求科威特的產油量不可超過 OPEC 訂定的配額，遭到科威特拒絕(Hassan, 1999)。在當時石油是伊拉克的經濟命脈，是償還外債重要的資金來源，科威特卻聯合其他 OPEC 國家壓低石油價格，這無疑威脅到伊拉克的收入來源，<sup>3</sup>被認為是伊拉克對科威特發動戰爭的其中重要原因。

債務可能會引起國家偏向發動軍事衝突的行為又如德國，德國在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根據《凡爾賽合約》，德國政府需於四十二年內賠償大量戰款。<sup>5</sup>然而由於負擔太重，自 1922 年末開始延遲付款(Anonymous, 1922)，引起債權國法國與比利時的不滿，兩國軍隊隨後於 1923 年 1 月佔領德國魯爾區，來脅迫德國還款，大約有 130 名德國平民在此事件中遭到殺害(Ritschl, 2013)。美國於 1924 年與 1929 年以兩項計畫—「道威斯計畫(Dawes Plan)」與「楊格計畫(Young Plan)」給予德國大量貸款，以及減免部分賠款，穩住德國的經濟。但 1929 年美國遭遇經濟大蕭條後，並停止給予德國貸款，這導致德國經濟迅速下滑，失業率也迅速攀升，促使國家社會主義的興起(Trueman, 2015)。<sup>6</sup>德國在欠債與缺乏資本流入的情況下，民選總統希特勒後來在 1933 年 5 月宣布拒絕履行還款義務，並在 1936 年進駐萊茵河非軍事區，又於 1938 年併吞奧地利(Kissinger, 1994)。雖然外債並非希特勒發動

---

<sup>3</sup> 科威特的採油技術進步，產量超出 OPEC 對其日產量的配額，造成石油的供給價格降低，嚴重影響伊拉克售出石油的利潤，引起伊拉克的不滿與反彈。

<sup>5</sup> 凡爾賽條約中要求德國賠償 2260 億金馬克(Britannica, 2021)。

<sup>6</sup> 1933 年德國有超過 600 萬人失業(Evans & Geary, 20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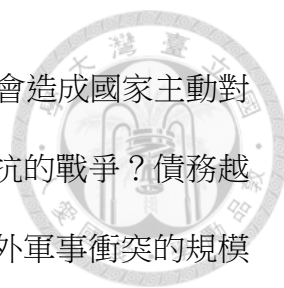
戰爭的主因，但無法償還外債的壓力卻也是導致他發動軍事衝突、乃至最後戰爭的重要原因。



可以說，以上三個例子中的債務國在對外發動衝突前，至少有一個共同特點也就是因為大量外債而面臨違約風險，以及受到一定程度國內外關於債務產生的壓力。這壓力讓債務國迫切需要透過新的融資或是減免債務等債務清償談判來緩解外債造成的諸多問題，同時維持現狀對他們而言，並不能作為立即有效去緩解債務壓力的辦法。相對地，發動衝突有可能為大量外債形成的困境提供破口，迫使債權國或國際金融組織由於債務國潛在的倒債可能性而讓步。戰爭與武力衝突即成為國家之間議價(bargaining)時的外部選項(Powell,2002)，能夠創造議價空間，來迫使對手國讓步(Fearon, 1995)。也就是說，鉅額外債的存在似乎讓這些國家更為好戰，並且用衝突或戰爭當作手段，一來脅迫債權國與國際金融組織願意就債務進行協商，二來緩解來自國內外的政治壓力。本文即想要探討和驗證是否有此現象的出現。

## 第二節 研究目的

過往探討國家的軍事衝突行為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從體系結構層次與國內層次出發，即使是國內層次的研究，也多聚焦於國家制度的影響與領導人的個人特質(Waltz, 1959:29-126)，較少關注低政治層面的總體金融。然而自二戰結束後，戰爭數量大幅降低，取而代之的是低層級的軍事衝突。而且全球貿易相互依賴的提升，國際間金融互動與國內總體經濟的影響劇增，國家對生存的考量，不再只著重於追求軍事安全等傳統權力的思維，國內經濟與財政穩定的重要性不亞於軍事能力。而不少文獻指出，一國的財政穩定與外債負擔的程度息息相關，可見得外債對於國家之間發生衝突可能扮演著關鍵角色。



因此，本研究系統性地探究以下幾個問題：外債的存在是否會造成國家主動對外發動軍事衝突？是有限的軍事衝突，或是會上升為大規模對抗的戰爭？債務越多的國家是否越容易向他國發動軍事衝突？債務越多的國家對外軍事衝突的規模是否會越大？

在過去的研究中將「債務」作為國家開啟軍事爭端的因素的學者有 Slantchev(2012)和 Lee(2017)。不過在軍事衝突行為當中，他們僅關注於國家間的戰爭行為，缺乏其他程度軍事衝突的討論，誠然戰爭是一個國家好戰程度的最高程度，但在戰爭大幅減少的當今社會，發動軍事衝突或許更能反映國家好戰行為的特質。在研究方法與範圍上，Slantchev(2012)係透過數學模型模擬相關情境，並非以實證研究來檢證外債與國家戰爭行為的關係。Lee(2017)雖然提供橫跨近 100 年的跨國跨時實證研究，但因為數據的不完整，最後僅能以 56 個國家作為研究標的。此外，在過往文獻中也未見完整的探討連結債務與衝突之間的機制，也忽略了債務國與債權人或其他國際金融組織的互動關係，既有文獻雖然呈現了債務與衝突之間有某種相關性，但其中運作的原理為何？以及，身負重債的國家如何有能力對外發動衝突？這些的研究仍闕如。

具體而言，本研究從國內層次的財政視角出發，以外債作為重要的解釋變項，探討國家的對外衝突行為。試圖綜合討論外債與其他衝突的戰爭要素對於戰爭和軍事衝突的影響，結合債務國與債權國之間的互動方式，呈現國家外債與衝突之間運作的關係，並以 192 個國家從統計上進行跨時跨國的實證研究。試圖提出一個一般性理論來解釋國家外債程度是否會使國家更加好戰，為國家間衝突行為的原因提供另一種可能的解釋，為國際政治經濟研究與衝突研究做補充與貢獻。



## 第二章 文獻回顧

### 第一節 外債與國家

討論本文的主要研究之前，本研究先是針對與國家債務相關的既有研究，進行文獻資料的分析與爬梳。大致分為兩個部分進行回顧與探討，第一部分，需要先探討何謂外部債務，為什麼過多的外債累積會對國家帶來負面的影響，有什麼樣的判斷指標以及標準，債務國又會因為外債累積造成的不良影響而進行什麼樣的債務解決方案，像是外部融資或是外債減免等債務清償談判。

第二部分，則是爬梳外債對國家行為的影響，以及債務國和債權國之間的互動關係的相關文獻。例如債權國會利用外債做出經濟國策的外交決策，或是國家透過外債借款來進行戰爭融資，抑或是債務國會因為債務作出相關衝突行為。最後再提出小結統整過去文獻的說法，並指出不足以及待補充之處

#### 壹、 外債

「外債」一作為公共債務的一部分，<sup>7</sup>指涉一個國家從外國的商業銀行、政府或是第三方國際金融機構借的債務，而且這些債務與其衍生的利息，通常必須由

---

<sup>7</sup> 公共債務(Public Debt)也可以稱為政府債務(Government Debt)、國家債務(National Debt)或主權債務(Sovereign Debt)，是國家政府所欠下或擔保的債務，由內部債務(Domestic Debt)與外部債務(External Debt)組成。公共債務有兩種統計方式，分別是政府的負債總和(Gross Debt)與淨債務(Net Debt)，因為前者數據資料較易取得，一般總體經濟多討論前者，而「政府」是泛指一般政府部門(General Government)，包含所有政府組織與非市場非營利機構(Chouraqi et al., 1986)。根據凱因斯理論，國家應該採取擴張性的經濟政策，例如貨幣擴張政策、舉債與擴大財政支出等，刺激總需求增長，以促進經濟成長，但如此作法亦會伴隨著大量債務累積(Keynes, 1936)。因此，就短期而言，公共債務能夠刺激需求與促使經濟成長，長期而言，則可能因為公共債務的累積，必須減少國家儲備(National Stock)與支出(National Outcome)。Kumar & Woo(2015)針對 1970 年至 2000 年先進與新



當初借貸的貨幣支付。根據 IMF 定義，外債是指一個經濟體居民欠非該經濟體居民的實際當前負債，且該債務要求債務人在未來償還本金與利息(IMF,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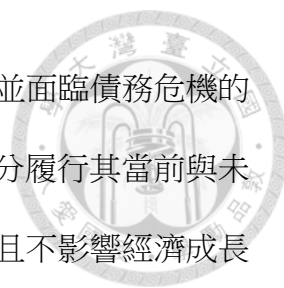
那國家是怎麼累積這麼多的外債？國家的外債累積大致可分為三個面向：對外直接借款、發行債券與金融赤字。首先，一個國家通常會向他國借款來彌補自身資金不足的問題，以取得其所需要的資源。具體來說，當國家面臨相關人道或災害時，由於國內缺乏相關資源與資金，會向他國借貸，取得緊急物資與幫助；或是國家可能陷入債務不可持續性的情況，<sup>8</sup>因此需要直接向他國政府或是國際金融組織融資，以度過財政或債務危機；又或是戰爭融資或是戰後賠款，錢在戰爭中非常重要，能夠決定軍事動員能力、戰爭長短與戰勝的可能性，因此在戰爭時，經常發生透過他國借貸來備戰的情形(Zielinski, 2016)。第二個面向，國家會向國際市場發行國家債券來獲取資金。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為了募集財政資金，進行國內的投資與基礎建設，向海外投資者提供高信用、穩定利息與到期償還本金的債權債務憑證(Gruber & Kamin, 2012)。最後，根據國家的總體經濟，國家的財政赤字、預算赤字與經常帳赤字亦會增加外債總量的累積(Kemal, 2001; Ali & Mustafa, 2012)。

與公共債務一樣，國家對於外債承受能力會因為不同國家的收入程度或是信用程度，而有所不同。若一債務國預計在未來沒有能力償還其外債，例如其財政或

---

興市場經濟體的公共債務，以及他們的長期經濟成長與投資三者間的關係進行研究，發現初始公共債務(Initial Debt level)水準越高，國家在未來的經濟成長會放緩，即債務對 GDP 的比率每增加 10%，人均 GDP 就會降低 0.2%，國內投資也會降低 0.4%的 GDP 數額。另外，在發達國家債務對 GDP 的比率每增加 10%，人均 GDP 則是降低 0.15%，且在高債務國家較明顯，而債務對 GDP 的比率增加造成國內投資額下降的部分對新興經濟體的影響較大。

<sup>8</sup> 一國的債務水準若是在國家能夠償還的可能性內，對國家有利無害，因為大量支出反而可以刺激經濟、增加投資與用來提升社會福利。相反地，若一國債務累積過多，可能會使該國無法履行未來的財政義務。也就是說，當一國遇到債務無法順利償還的情況，其債務會被認為是「不可持續性的」(Unsustainable)，且會反映出一個國家未來發生債務危機的可能性與脆弱性。而且債務變得不可持續時，會產生債務積壓效應(Debt Overhang Effect)，缺少資金的該國會降低投資與改革的意願(Roubini, 2001:9-10)，因為投資代表國家未來的資本儲備(Future Capital Stock)。以此觀之，當一個國家面臨降低投資的情況時，將會影響到未來的流動性，讓國家同時面臨債務積壓效應產生的低產出與低經濟成長之惡性循環，更讓國家無法償還所積欠之債務。



經常帳出現赤字，則該國的外債被稱為不可持續性，將導致違約並面臨債務危機的風險。IMF 也定義一個國家的外債能保有持續性，是指能夠充分履行其當前與未來的外債償還義務，且不需要重新調整債務期限或延遲給付，並且不影響經濟成長 (IDA & IMF, 2001)。外債的不可持續性的成因可能來自於政策失敗、公共財政的無力控制、人為的高匯率水準、戰爭、經濟衝擊、物價或是自然災害所造成 (IMF, 2000)。

通常衡量一個國家的外債是否保持可持續性，是端看該國的出口、GDP 與政府收入，因為一個國家償還外債的償還辦法通常是仰賴經常帳盈餘與財政盈餘，而進出口貿易與財政擴張及整合會主導一國的國際收支賬平衡。普遍衡量指標則為「外債對 GDP 的比率」(External Debt to GDP ratios)與「外債對出口的比率」(External Debt to Export ratios)，這兩種指標各有其優缺點，然而前者比後者有優勢且實用，因為可以去除匯率低估或高估的影響，後者則是能夠觀察一個國家將國內資源轉向出口生產來償還債務的潛力 (IMF, 2000)。Kraay & Nehru (2006) 也認為外債對出口的比率也是做為衡量國家外債可持續性的良好指標，因為國家的出口提供支付外債所需要的強勢貨幣，例如美元，更能反映國家對外債的負擔程度。

若一國的外債對 GDP 的比率越高或是外債對出口的比例，則越有可能難以償還債務，而深陷債務不可持續性。這種情況可能會導致債務積壓效應，排擠到投資與社會福利支出，抑制資本流動，以及造成未來資源獲取的不確定性，甚至違約等經濟問題 (Arnone et al., 2005)。

IMF 調查 1979 年至 2001 年的四十三次債務危機，發現若外債對 GDP 的比率低於 40% 的話，發生債務危機的機率為 2-5%，反之，若外債對 GDP 的比率高於 40% 的話，發生債務危機的機率則上升至 15-20% (IMF, 2002)。除此之外，IMF 在 2003 年的調查中發現，高額債務確實會抑制重債窮國 (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 的經濟成長，然而若重債窮國的外債存量大幅減少將會直接使人均收入每年增長



1%，若減少支付外債的利息，並將其用於公共投資，同時不新增預算赤字，則部分重債窮國的經濟增長可能會加速，每年大約增長 0.5%(IMF, 2003)。

有鑑於此，世界銀行與 IMF 於 2015 年為重債窮國等低收入國家提供一個債務可持續性框架(Debt Sustainability Framework)，協助為低收入國家籌措資金，減少過多的未來債務累積。這個框架將低收入國家依照低、中、高三種不同的債務負擔能力，給予可持續性的閾值；負擔能力越高的國家，其外債對 GDP 的比率與外債對出口的比率越高，見於表 2 - 1 (IMF, 2021)。

重債窮國目前是由三十九個貧窮及債務負擔嚴重的開發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y)組成的集團，IMF 與世界銀行極力幫助重債窮國與中低收入國家減少外債，確保他們能夠應付債務帶來的問題與負擔，包含提倡《重債窮國倡議》 (HIPC Initiative)（以下稱《倡議》）、《債務永續框架》(Debt Sustainability Framework)與《減少貧窮與經濟成長信任》(Poverty reduction and growth trust)，給予債務減免或低息融資，目標是使這些國家的債務可以回到債務可持續性的水準。<sup>9</sup>

表 2 - 1 債務可持續性框架下的債務負擔閾值<sup>10</sup>

	外債對 GDP 的比率	外債對出口的比率
低	30%	140%
中	40%	180%
高	50%	240%

資料來源：IMF, 2021

<sup>9</sup> 關於《倡議》在下節討論。

<sup>10</sup> 低中高是指國家債務負擔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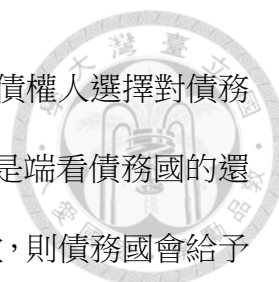
## 貳、 外債融資與減免

一個國家在面臨不可持續性債務所導致的若干問題時，會面臨該國的投资減少，經濟成長下跌等經濟惡化問題之惡性循環，也可能會無法履行償還債務的義務。在這樣情況下，債務國會有多種策略選擇，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非自願性行動」(Involuntary action)與「自願性行動」(Voluntary action)。非自願行動為債權人們（包含一般債權國、銀行或是國際金融組織）一致給予債務國新的借貸，進行「融資」(Finance)來償還即將到期的債務或是一致給予部分的債務放棄(Debt forgiveness)。自願性行動為以市場為基礎的減債方案(Market-based debt reduction Scheme)與債務國立即性的「違約」(Default)。

### 一、 非自願性行動

自 1982 年，協調借貸(Concerted lending)或稱為非自願性借貸(Involuntary lending)這種債務國的非自願行動蔚為風潮，原因是許多拖延償債或是債務不履行的國家在資本市場中缺乏信用，導致其無法自願地融資。債權人們擔心債務國違約風險的損失，同時也欲穩固與保護自身現有的債權(Claim)，於是在一致協商後，在接受預期損失(Expected loss)的情況下，為債務國提供新的借貸，給予延長債務償還的機會，試圖使之盡快以有信用的身份條件回到資本市場(Cline, 1984; Krugman, 1998a:259)。Cline(1984:75)認為若新借貸的期望收益大於期望損失，債務人才有誘因提供新的借貸。

另一種非自願性行動是債權人放棄部分債務，Krugman(1988a)認為債權人向債務國債務減免是為了避免債務人對其處境太過無力，而放棄增進自己還款的能力。Claessens(1991:4-5)則認為對於高度債務國家來說，債務減免比起



協調借貸更合適，對債務國與其債權人皆有益處。事實上，債權人選擇對債務國進行融資或是減少債務是一種權衡(Tradeoff)，權衡方式是端看債務國的還款能力與財政調整意圖，若債務國在未來可能仍有能力還款，則債務國會給予融資。反之，若債務國在未來完全無法還款，且抱持著低調整意圖，則債務國會放棄部分債款，藉此增加債權國償還剩餘債務的可能性(Krugman,1988a)。

除了 Krugman 提出債權人對解決債務國債務的權衡策略外，Krugman(1988b)、Sachs(1989)、Agénor(2005)與 Ștefania(2014)皆從 Debt-Laffer 曲線來觀察債務國的還款能力(圖 2-1)，探討債權人對債務國的直接債務減免的有效性，以及何時進行新的借貸或直接債務減免的策略選擇。<sup>112</sup>

---

<sup>11</sup> 舉例來說，當某債務國的債務累積在 A 點以前，由於債務的名目價值(Nominal value)與市場價值(Market value)(債務國的預期支付)是相等的，則債權國會得到全額償債。若是債務累積介在 A 與 B 之間，隨著債務的增加，債務的邊際市場價值雖然是遞減，但其市場價值仍是處於增加狀態，在此時債權國可能會懷疑債務國的還款能力，卻仍不會減債，可以稱這個情況為 Debt-Laffer 曲線的正確位置。當債務累積在 B 的右側時，債務的名目價值與市場價值成反向關係，此時債務國會陷入債務積壓效應，債權國需要減債來增加債務的市場價值，可以稱這個情況為 Debt-Laffer 曲線的錯誤位置。因此，當債務國的債務累積是位於 Debt-Laffer 曲線的錯誤位置時，債權國與債務國能同時在債務減免中受益。綜合上述，當債權國的債務累積位於 Debt-Laffer 曲線的正確位置時，債權國們的協同借款(Concerted lending)能延遲債務國的還款義務，並最可能提高債權國還款的可能性；反之，當債權國的債務累積位於 Debt-Laffer 曲線的錯誤位置時，借貸新的款項給債務國就不是個好的選項，因為在那時新的借款只會降低債務的市場價值，而透過對債務國減債，對於債權國才是較好且較能被接受的選項。

<sup>12</sup> Husain(1993)也提出一個考量到債務危機的抑制投資效應(Investment disincentive effect)與流動性效應(liquidity effect)的減債模型，認為除非在債務國 Debt-Laffer 曲線的錯誤位置時且同時受到嚴重的流動性限制，否則不應同時提供新的資金和債務削減方案。然而 Claessens(1990)透過實證研究發現只有很少數的重債窮國家會落在 Debt-Laffer 曲線的錯誤位置。如此一來，雖然 Debt-Laffer 曲線確實能夠提供債權人判斷何時給予債務國減債或融資的正確時間點，但多數重債國的條件皆並非落在 Debt-Laffer 曲線的錯誤位置，因此在現實世界中，債權人提供債務國債務融資相較於放棄部分債務似乎更為普遍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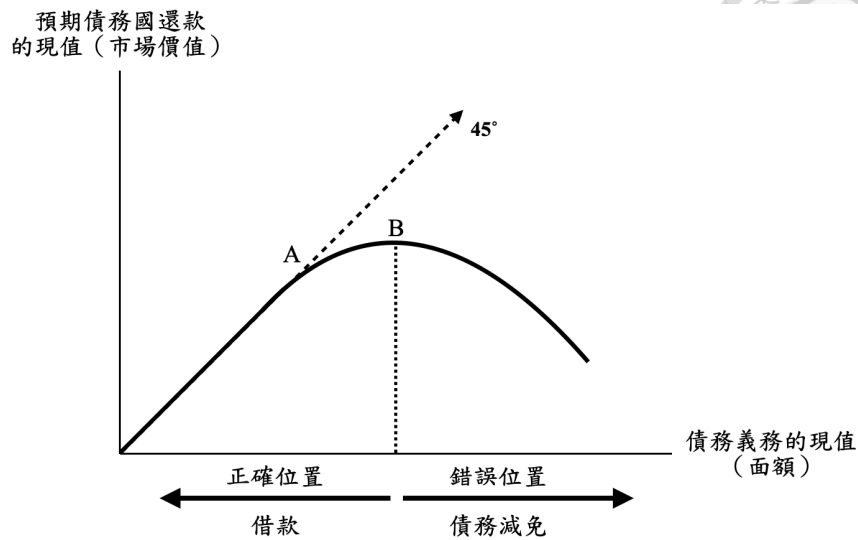


圖 2 - 1 Debt-Laffer 曲線

資料來源：修改自(Krugman, 1988b)

事實上，債權人對債務國的新一輪融資或是減債並非無償，而是基於一定條件下進行。債權人會要求債務國做出財政調整努力(Adjustment effort)，例如匯率調整、預算政策(Budgetary policies)與投資等，來增加債務國未來對資源轉換的優勢，藉此提高還債可能性(Krugman, 1988a)。如債權人會要求債務國進行國內經濟調整，來實施維繫其債權價值的政策(Setser, 2008:18)。IMF 則是會向債務國開出非常嚴苛與複雜的條件，強迫債務國進行財政政策調整，來為 IMF 的借貸提供充分的保障，這些條件通常使債務國難以接受(Khan,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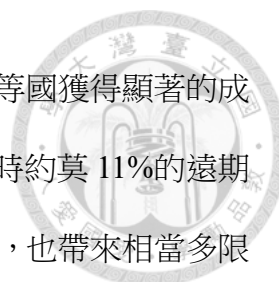
總結來說，債權人無論是選擇對債務國進行融資或是減少債務所做出的策略選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護其現存的債權，包含避免債務國的立即性違約，給予債務國提升還款能力的動機，以及能夠最大化汲取債務國的資源。債權人所開出的相關條件時常難被債務國所接受，或是勉強接受債權人的條件，而讓渡出自己本該掌握的財政權力。



## 二、 自願性行動

另一種債務國能進行的減債策略選擇是「自願性行動」，有以「市場為基礎的減債方案」與「立即性的違約」。因為債務國新的借貸與直接的債務減免可能對於債權人有所限制，而且會有部分債權人的搭便車問題，所以市場為基礎的減債方案通常是債務國作為非自願性行動的替代方案。債務國透過次級市場(Secondary Market)擁有的貼現率(Discount rate)，進行債務買賣來達到減債的目的。這個策略也有許多限制，需要債務國使用自身資源，且無法保證使債務國與其債權人雙方都能得到好處，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可能會同時傷害到債務國與債權人雙方(Claessens, 1991:7)。因此，評估以市場為基礎的減債方案對效率，以及對債務國與債權人之間的債務負擔分配的相關影響是相當重要的課題。這種以市場為基礎的減債方案大致上有三種，分別是債務購回(Debt buy-back)、證券化(Securitization)與債轉股(Debt equity swap)。<sup>13</sup>

<sup>13</sup> 債務國利用外匯存底在次級市場以大幅度的折扣(Substantial discount)買回自己的債務來達到減債效果稱為「債務購回」。直觀來說，這種以低於債務面額的交易債務的策略，會減少債權人的總預期收益，因此需要檢視其可行性。Dooley(1988)與 Rodriguez(1988)提出讓債務國之債權人認識到債務購回的成本與回購後的債務形式與價格，才使之有誘因賣回債務。Bulow & Rogoff(1988)透過區分債務購回這個方案中的一般價格與邊際價格來評估債務國的收益，認為這個方案實際作用很小，債務國不該浪費資源買回其債務，除非這個方案的進行同時是基於債權國給予實質的讓步與補償。Claessens(1991)則是從債務購回行動中的邊際成本與收益來計算債務國的收益與債權人的損失。最後，Krugman(1988b:268)認為只有債務國是位於 Debt-Laffer 曲線的錯誤位置時，債務回購才對債權人有好處。另一種基於市場的減債策略是「證券化」，將債務重新包裝成具有談判工具身份的債券，並以低價發售於次級市場，來達到減債的效果。被轉換後的債務，因為具有談判特性，可以將其折扣交易，吸引原本的債權人或是第三方投資團體購買。然而這卻需要在一定條件下進行。例如這個證券化策略需要提出類似現今的抵押品來保障購買人權利，或是有第三方機構例如世界銀行來擔任保證人(Plehn, 1989:184)。Krugman(1988b:271)則從 Debt-Laffer 觀察證券化策略，認為只有債務國是位於曲線的錯誤位置時，債權人才有動機執行。最後一種策略是「債轉股」，是基於市場的減債策略中最廣為人知。這種策略是債權國以折價或等值的方式出售其債權，以之換取債務國的貨幣，再將換取的貨幣投資於債務國當地的股票以得到股權，同時債務國也能得到額外的資本流入。對於債務國來說，債權國對債務國要求的利潤匯回，比起債務國的利息支付，更會影響債務國的經濟活動，因此債務國需要新的投資初期限制利潤和資本匯回，以緩解流動性問題。然而，債務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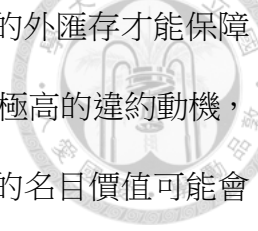
雖然這幾種債方案在 1980 年代的智利、巴西與墨西哥等國獲得顯著的成果，也於 1982 年前共減少了 270 億美元的債權，換算成當時約莫 11% 的遠期債權，但事實上這種減債方式治標不治本，除了進度緩慢外，也帶來相當多限制。例如這些國家超過 85% 的減債效果都是透過債務購回與債務轉換股權的方式，雖然帳面上減少了部分債務，卻增加短期融資的需求。而且債務購回的策略只能由現金外匯充足的國家執行，因為債轉股的未來利潤成本會高於因為轉股權而減少的債務現值(Husain, 1989:152)。因此，這種市場為基礎的減債方案對於國家整體的債務減免效果其實有限，不但需要在短期內向他國尋求新一輪的融資，而且還會累積新的債務。

當債務國認為「直接違約」的利益大於成本，就有可能直接違約。事實上外債的違約在歷史上並不罕見，二次大戰以後，內債違約的機率比外債違約的機率高(Reinhart & Rogoff, 2009:136)，但是國家一般是不會輕易的違約。Gooptu(1996)總結諸多研究認為，債權國會在債務國家倒債後對其進行相關的經濟報復，例如減少債務國獲得貿易信貸(Trade credits)的機會、限制債務國新的融資或是沒收債務國的離岸財產等，因此國家倒債的條件是倒債所帶來的利益高於債權國之懲罰。<sup>14</sup>Cline(1984:87-90)從長短期信用市場的層面來看債務國違約，認為債務國長期上除了無法得到信貸市場的融資外，在短期內的買

---

帳面上的債務雖然減少，但這種策略其實只是以新的義務取代舊的義務，可能並沒有實際減少外債現值(Edward, 1990)。Krugman(1988b:274)認為債轉股策略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債務購回與證券化的組合，因此同理前段，債務國需要位於 Debt-Laffer 曲線的錯誤位置時，債權國才能在此策略中得利。

<sup>14</sup> 關於國家是否會在違約後受到處罰，在學界中仍存在許多辯論。例如 Eichengreen(1987)發現沒有經驗支持 1930 年代的國家在倒債後會比正常回債的國家更難借到新的貸款。Bulow and Rogoff (1989)也認為債權人借貸給低度開發國家並不是依據該國是否會償債的聲譽，而是依據是否存在能威脅到該國利益的政治手段或法律權利。因此，債權國能夠對低度開發國家在違約後造成的實際損害存在許多不確定性，且對違約國的制裁效果也有限，因為與違約國有密切政治合作或貿易合作的第三方國家可能不同意違約國受到債權國制裁，債權國也有強烈動機欲盡快與違約國重新談判債務問題，以維護其債權，這將使得一個國家在外債違約後很可能會有一段為時不短且難以觀察的懲罰期的存在(Tirole, 2002:79-80)。



易進口也不得不用外匯現金，這意味著違約國得有六個月的外匯存才能保障順利進行進出口貿易。此外，只有在一種情況下，債務國有極高的違約動機，就是當債務國進入債務循環(Debt cycle)後期時，利息支付的名目價值可能會逼近甚至超越新的借貸，在這樣的條件下，停止支付的高額利息，能夠抵銷違約所失去的新借貸損失。

總而言之，債務國在深陷債務不可持續性問題時，會希望債權國能夠對其伸出援手解決債務問題，無論是自願性行動中的新融資與直接借貸，或是以市場為基礎的減債策略，避免直接違約。然而減債策略有其限制與債權國的偏好問題，首先，以市場為基礎的減債策略並非能夠替代直接融資與直接放棄債務，因為除非債務國位於 Debt-Laffer 曲線的錯誤位置，債權國沒有動機去配合這三種減債策略。其次，在現實世界中，位於 Debt-Laffer 曲線中錯誤位置的國家很少，因此以市場為基礎的減債策略基本上都會使債權人的利益受到損失。再次，債權國給予債務國新的融資僅僅延遲立即性的違約，並提高原本就存在的債權，卻不一定提高債務國的還款可能性。最後，無論是部分債務減免或是透過次級市場的折扣減債，皆會危害到債權人取得原先所有償債的機會。因此，除非債權國擔憂債務國會直接倒債與破產，使其拿不回任何的債款，否則並不會輕易自願放棄部分債權，豪賭債務國會因為融資或減債改善它的還債條件。

### 三、 外債減免

當債務國的外債變得不可持續性時，他們也可以向債權國融資、要求債務減免或是透過以市場為基礎的減債策略，倘若皆難以執行，則除了違約外，還能請求國際金融組織協助。IMF 與世界銀行提倡的《倡議》等債務解決方案就

是為此而產生，但債務國必須滿足 IMF 要求的條件，才會給予協助。<sup>15</sup>

事實上，即使 IMF 與世界銀行提供若干倡議來幫助許多國家，但身負重債的國家仍面對許多限制。例如在《倡議》中，部分國家雖為《倡議》資格國，卻無法完成《倡議》的條件，故無法拿到完整的外債減免，或是要達到《倡議》所認為的外債不可持續性之門檻過於狹窄，重債國家難以達到《倡議》的先決條件，因此無法被認定為資格國 (Carrasco, 2007)。並且，非洲、加勒比與太平洋國家集團(ACP)的部長們雖贊同 IMF 與世界銀行對他們提供的協助，卻認為他們開出的條件太過嚴苛，希望能夠增加援助的彈性，包含縮短援助的時程，確保初始階段提供部分債務減免，以及降低資格門檻來擴大非《倡議》國家的參與(IDA & IMF, 1999)。此外，除了在《倡議》中或與其他 IMF 與世界銀行減債計劃的受惠國外，仍有許多需要幫助的國家被排除在外，且他們面對著即將來臨的償債期限，仍持續深陷在違約與債務危機的兩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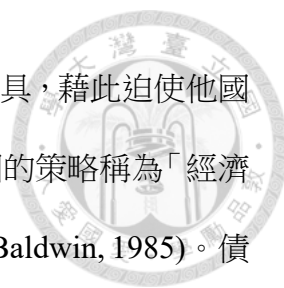
## 第二節 外債對國家行為的影響

### 壹、 債務作為債權國家的槓桿工具

一個國家能夠利用向他國借貸來獲得缺乏的資源與建設國家，卻也會因為外債的過多累積導致國家的債務不可持續性，影響一國的經濟與信用。對於債權國來

---


<sup>15</sup> 債務國必須符合《倡議》中兩階段的程序，才能得到完整或部分的債務減免。在第一階段中債務國必須符合四個先決條件，分別是：1. 有資格向世界銀行的國際開發署(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貸款；2. 無法透過傳統債務減免機制解決不可持續性的債務負擔；3. 透過 IMF 與世界銀行支持的專案，建立改革與完善政策的追蹤紀錄；4. 建立減貧策略白皮書。一旦一國被認定符合資格，將被納入被協助的名單中，IMF 與世界銀行會承諾幫助該國減債至符合可持續性之債務標準，也就是降到外債對出口比例低於 200-250%。再者，債務國需要完成三個標準，才能獲得完整與不可逆的減債協助，分別是：1. 建立追蹤紀錄；2. 確實執行先決條件；3. 採納與執行減貧策略白皮書至少一年，即可得到在先決條件中，IMF 與世界銀行所提供的承諾(IDA & IMF, 1999; IMF, 2021)。



說，債務也可以成為一種武器，給予債權國影響債務國的政治工具，藉此迫使他國進行政治轉向或讓步。而這種國家企圖透過經濟手段來影響他國的策略稱為「經濟國策(economic statecraft)」，通常有制裁、援助、協議三種手段(Baldwin, 1985)。債權國利用與債務國不對稱的權力分配進行相關政治或軍事行為是經濟國策中的制裁行為。Drezner(2009:13-15)認為債務會讓債權國能夠利用債務作為金融槓桿，來迫使債務國進行政治轉向或讓步。此債務槓桿有兩種途徑，分別為嚇阻(deterrence)與強迫(compellence)。前者是因為債權國擁有較高的金融自主權(autonomy)，能利用債務等金融資產來避開債務國對債權國進行的一些政治施壓，降低某些政治紛爭的緊張局勢；後者則是債權國藉由經濟國策來逼迫債務國讓步，包含債務清償、減緩新的融資、拋棄債務國國債與停止投資債務國等。

歷史上有若干債權國因為債務逼迫債務國政治讓步的案例。如十九世紀有許多債權國以貿易制裁或軍事干預威脅債務國來保護自身的投資(Mitchener, 2010)。例如，1882年，由於埃及疏於對公共債務的管理，使法國與英國接管埃及的財政，英國更是完全掌握埃及的政治(Ferguson, 2001)。又如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美國除了大量拋售英鎊，導致英國出現收支問題，同時拒絕英國在IMF緊急貸款的請求，脅迫英國停火，並解除對蘇伊士運河的軍事部署(Setter, 2008)。中國則是利用斯里蘭卡積欠大量的建設貸款，租借斯里蘭卡南部深水大港漢班托塔198年(Wignaraja, 2020)。更甚者，有若干債權國透過軍事入侵債務國來逼迫還債的案例。例如在兩次大戰戰間期，德國由於遲交賠款，魯爾區遭到英法兩國佔領(Kissinger, 1994)。

1861年由於墨西哥總統停止支付其債務的利息，身為最大的債權國之一的法國軍事於是入侵墨西哥，並藉軍事佔領扶植奧地利的一位大公建立墨西哥帝國(Hernández-Sáenz, 2018)。1902年委內瑞拉債務違約，債權國英國、德國與義大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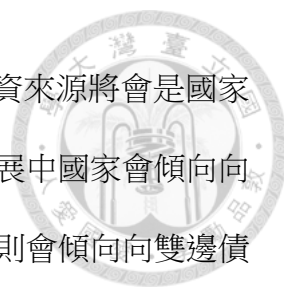


實施海上封鎖委內瑞拉之港口，迫使委內瑞拉處理與仲裁他們的債權(Mitchell, 1996:186-187)。1902 年多明尼加政府施政問題使其無法妥善處理外債，讓歐洲債權人揚言要使用軍事行動(Laurent, 2019)。還有 1916 年美國銀行家擔心海地會違約，美國海軍陸戰隊強行進入海地搬走價值 11 億美金的黃金，也控制了海地政府(Bauduy, 2015)。這些債務國雖然是因為自己先是違反義務，而受到債權國的脅迫，但被債權國強迫進行的政治轉向以及政治讓步的後果使他們蒙受更多損失，可能讓他們國家身處的情況更為嚴峻，債務問題更難去解決。

## 貳、 外債與衝突

大多數有關政府外債對國家影響的文章皆是在談國家面對外債的不可持續性而引發的債務違約與債務危機，或是國家如何向其債權國合作或是接受國際金融組織的援助，來擺脫身負重債的困境，探討債務與衝突的文章相當少。除了前述債權國可能會以武力侵犯債務國造成兩國衝突外，外債在國家間衝突又會扮演什麼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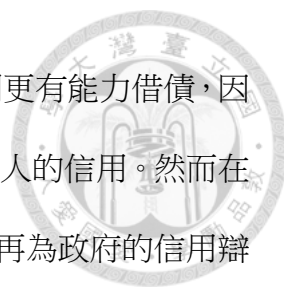
首先，借債為國家在衝突與戰爭時期進行融資的手段之一，藉由借債轉化資源至軍事實力，提升自身在戰場上的動員能力，決定衝突與戰爭的結果。但一國是否要對外發動衝突，勢必要考量到衝突帶來的損失對國內的影響，不論是人民對徵稅的反彈或是通貨膨脹與開支削減，對外借款對國內的傷害與影響會比其他的融資手段還要低。潛在融資來源大致有國際金融組織，包含世界銀行與 IMF、主權債券市場(Sovereign Bond Market)與國際援助(Foreign aid)，國家會考量到自身的情況，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借貸組合。然而一些發展中國家政府會特別慎思這些融資來源的成本和收益，再做出融資選擇，因為這些國家會擔心其對外借款的數額與條件



可能會影響國家執政的穩定，因此較少公開披露債務承諾的融資來源將會是國家的首選，透明度低是國家的首要考量。例如在私人信貸層面，發展中國家會傾向向商業銀行借款而非發行主權證券；在官方信貸層面，發展中國家則會傾向向雙邊債權人(Bilateral creditors)借款而非多邊國際金融組織(Arias et al., 2021)。有若干研究對國家在衝突與戰爭中的借貸融資行為進行不同面向的剖析。

Flores-Macías 和 Krep(2017)解釋民主國家的衝突融資方式與人民支持作戰之間的關係，是如何影響該國領導人執行相關衝突手段。以美國與英國這兩個民主國家為實驗目標，透過訪談實驗法分別訪談 2500 名美國成年人與 2122 名英國成年人，設定政府向外發動戰爭與其如何進行戰爭融資的情境，並利用近期兩個國家將對外發動戰爭的所以需要融資作為假定狀況。他們認為若一個國家是透過對外借債的方式，而非對人民徵稅，可以避免大眾對戰爭成本與損失的直接感受，減少人民反對戰爭的傾向，增加人民支持國家參與戰爭，並創造領導人進行戰爭相關行為的空間。Schultz 和 Weingast(2003)認為自由民主制度相關的限制增加了國家償還債務的可能性，使民主國家相較於威權國家更容易借到錢，這能提供民主國家與其他國家在持續的衝突中擁有更多的競爭優勢。Carter 和 Palmer(2016)認為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在進行戰爭融資的選擇時，皆避免透過徵稅與通貨膨脹，更傾向對外借債，他們研究 1950 年至 2007 年的所有戰爭發現，與 Schultz and Weingast(2003)研究中的民主優勢相反，民主國家並非一定會比非民主國家借更多的債來進行戰爭融資。

因為是外借款來融資，國家能夠藉此來規避人民對其的約束。DiGiuseppe(2015)認為若一個國家能夠保有良好信譽，且能順利進入信貸市場，則該國領導人能夠將借貸的經濟成本推延至未來支付，增加他對外發動衝突的自主權。Poast(2015)透過實證研究的方式檢驗 1816 年至 1914 年期間內的所有戰爭，發現戰爭期間國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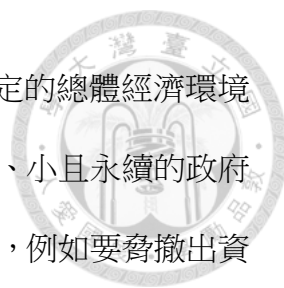
中央銀行能夠扮演降低國家借貸成本的角色，使國家在戰爭期間更有能力借債，因為中央銀行作為國家的擔保人，避免國家倒債，提升國家對借貸人的信用。然而在一戰後，央行的角色定位從財政管理轉移到控制通膨，央行便不再為政府的信用辯護。Garriga(2021)也認為中央銀行能作為國家宏觀經濟穩定和償債方面的擔保人，增強政府獲得信貸融資的能力，使之更有機會結束內戰。

Shea(2016)則是從政體切入，他認為軍事獨裁政體的國家透過向信貸市場借款發展自身軍備、增加軍事力量的情形，會使其對手國有動機向其採取預防性舉措，成為軍事衝突的目標。Krainin 等學者(2021)也從類似的視角建立一個由承諾問題和主權貸款組合的模型，他們認為崛起國家可以透過資本市場融資，如信貸或債券市場，來避免衰弱霸權對崛起國家的預防性戰爭。因為根據權力移轉理論，衰弱霸權會透過預防性戰爭來避免權力移轉，並封鎖崛起國取得資源的道路，使崛起國的談判地位缺乏流動性，<sup>18</sup>繼而使雙方暴露在戰爭的風險中。國際借貸者不只提供爭端國家融資，一些國際借貸者還會提供資訊降低借貸國的資訊不對稱風險，從而減少衝突發生的可能 (Shea, 2020)。

其次，有許多文獻指出，債務與衝突或戰爭之間存在直接或間接的關係。Slantchev(2012)提出戰爭融資模型，認為債務國在和平時期的成本比起戰爭時期還要來得高，因為和平時期需要還債，戰敗可以倒債，而且可以不斷融資以加強自身軍事動員能力，在利益權衡之下，有動機透過戰爭使對手國讓步。雖然歷史上戰敗國家在戰敗後時常違約，不過 Shea & Poast(2018)觀察過去的違約事件，發現戰敗確實比起戰勝更容易違約，但在統計上卻不具顯著性差異。這些研究忽略了戰爭帶來的影響，例如國內經濟惡化，可能才是造成戰敗國違約的因素。


---

<sup>18</sup> 借貸者不確定崛起國能不能順利轉移權力，因此崛起國不一定借得到錢，但基本上崛起國還是可以透過借款，即借未來的資源來增加自身的談判籌碼(Krainin, 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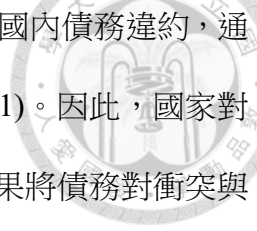
Kirshner(2007)提出國內金融業與國際金融體系最希望在穩定的總體經濟環境中運作，包含低通膨的市場、平衡的政府預算、適度的政府支出、小且永續的政府債務水準等，因此反對戰爭。他們會在一定程度上透過自身槓桿，例如要脅撤出資本，堅持綏靖政策等方式，遊說在戰爭邊緣的國家，減少衝突發生的機會。Goldmann(2012)卻提到主權債務危機(Sovereign debt crisis)會降低債務國內部社會經濟權力的展現。因為債權人在主權債務危機發生時較不願意接受國家的債務解決模式或是選擇與債務國訴訟，這會阻礙債務國儘早調整債務與解決債務的能力，增加國內不穩定，甚至導致內戰。這些研究並未考量到債務的水準會影響到債務國的決策，雖然債務國在某種程度上會應債權人的要求，做出若干符合債權人偏好的政策，然而當債務國的債務達到不可持續性地水準時，經濟情況的惡化很有可能反而使這些債權國的影響力下降。

Carmignani(2013)檢驗非洲經濟體在 44 場衝突發生後所累積的債務在十年內對再一次爆發戰爭風險的影響，結果發現外債實際上使戰爭更有可能發生，國內債務則無此影響，若早日減少債務，能夠促進和平。Alvarez-Plata(2006)發現衝突國家（非洲的莫三比克、烏干達與剛果共和國）比起非衝突國家有更多的外債累積，而且有較多的不可持續性債務。衝突結束後的國家增加了財政不確定性、重建的財政需求與外國援助的依賴性，而這些債務問題若沒有管理好，會導致衝突重新爆發。Hintjens(1999)也從財政角度解釋了盧安達的種族屠殺，盧安達從 1990 年開始有大量的外債累積，政府同時在該年初採取貨幣緊縮措施，加劇了種族緊張局勢，而引發內戰。Chiminya 等學者(2018)研究 1988 年至 2013 年非洲撒哈拉以南 (Sub Saharan Africa) 地區國家的衝突與軍事支出對外債的累積，發現國家間的紛爭確實會增長軍費開支，以保護國家資源，同時累積大量外債，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軍事衝突的發生。



Shea 和 Poast(2018)研究了國家在戰爭後的行為選擇，他們認為國家無論是在戰爭中打贏或打輸，都不會倒債，會好好地履行義務，而且戰爭的結果並不是影響是否會違約的因素，國家的預期違約行為才是。如果一個國家一開始違約可能性越大，越不可能捲入戰爭，如果一個國家一開始違約可能性較小，則越可能捲入戰爭。然而此研究卻無法解釋國家因為戰爭或衝突後的經濟惡化所導致的違約行為，例如 1982 年福克蘭戰爭的阿根廷，抑或是也有不少國家因為面對違約壓力反而變得更好戰(Lee, 2017)。由此可見，違約是戰爭的後果而非是國家的預期行為，違約與戰爭之間的關係，應聚焦在戰爭帶來的後續影響，以及國家對於債務負擔的忍受度。

Lee(2017)以迴歸模型檢驗 1816 年至 2007 年 56 個國家的公共債務對衝突行為的影響，發現若考量到利率因素，高利率會使國家的債務負擔更加嚴重，在可忍受的範圍內會試圖避免戰爭。但若到達不可持續性的債務水準，債務國的利益與成本考量將會改變，這不僅削弱和平的誘因，還使其變得更加侵略性，並選擇將紛爭上升至戰爭行為，孤注一擲求取在戰爭中勝出，目的是增加自身談判的優勢，讓自身最低限度的要求被滿足。換句話說，若債務國在和平談判的收益低於其償還債務的成本，則國家會傾向發動戰爭。文中提到公共債務與戰爭之間的相關性並沒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差異，但將公共債務與利率交乘後，卻有了統計上的顯著性差異，意即債務的量並非決定國家的負擔程度，債務的還款成本才是國家無法承受的原因(Lee, 2017)。然而，此研究雖然透過利率的概念，對國家的債務負擔程度進行更細緻的操作化，但卻忽略公共債務是由內債與外債組成，而這兩種債務事實上對國家的債務負擔有程度上的不同。相較於外債，國家對於內債的負忍受程度會更高，因為內債是債務國向本國人與機構借貸，且由債務國的本國貨幣計價，因此債務國不但握有本國貨幣計價的優勢(Panizza, 2008)，也有相當多手段來進行內債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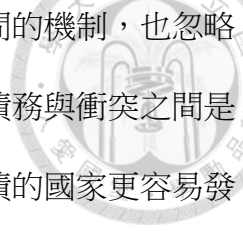
務減免，甚至規避掉債務的義務。具體來說，債務國執行公然的國內債務違約，通常只會在嚴重的總體經濟困境下發生(Reinhart & Rogoff, 2009:111)。因此，國家對外債的累積著實更為敏感，也較能反映國家債務的負擔程度，如果將債務對衝突與戰爭的影響聚焦在外債上面，或許更能顯現出債務對戰爭與衝突的影響。

### 第三節 小結

本研究在本章節為既有研究對債務與國家之間的關係進行系統性的爬梳。整體來說，國家累積的外部債務在短期內對國家是不可或缺的資源活水，長期下來如果管理不當，會導致債務不可持續，拖累國家當下與未來的資金使用與信用，使國家不只陷入短暫的違約危機，甚至需要面對長期的經濟衰退。

外債是債務國極需迫切解決的問題，因為國家不但有向外國債權人還款的義務，同時也很有可能需要面臨外國施加的政治壓力，且能夠解決外債問題的手段相當有限，使得外債債務忍受度較內債低，因此，債務國可能需要其他較為激進的手段來迫使債權國與國際金融組織即便減損報酬率，也願意與債務國談判解決外債問題。這也使得債務可能作為一國壓迫他國的理由，而成為衝突與戰爭發生的媒介。

然而在既有研究中，仍有不少缺漏。例如過去的文獻在案例的選擇並沒有一個一般性的實證研究，僅探討部分國家，或是區域性的國家，像是非洲經濟體或是後衝突國家的外債與戰後行為的關聯性研究。在探討外債對國家行為影響的部分時，大部分皆研究內戰與戰爭，鮮少討論戰爭之前的衝突行為。而且在變項的界定也不太清楚，沒有區分公共債務中內外債的差異，忽略國家對這兩種債務的容忍度不同，可能對衝突或戰爭的影響效果也有所不同。



另一方面，現有研究並未建立一個完整連結債務與衝突之間的機制，也忽略了債務國與債權人或其他國際金融組織的互動關係，難以理解債務與衝突之間是如何運作的。尤其是對於與直覺不相符的假設，也就是身負重債的國家更容易發動對外衝突，更難以解釋。因此本文將論證「外債負擔」提供了中低收入國家與重債窮國誘因，是選擇向外衝突的關鍵因素，彌補既有文獻在探討外債與衝突行為的遺漏之處。

###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假設



#### 第一節 公共債務、外債與內債

國家的公共債務是由內債與外債組合而成，這兩者皆可以為國家提供資金，讓國家的財政能保持一定的流動性，也會因為債務的不可持續性，使國家陷入違約風險。當國家面對債務時，都會有償還的義務與壓力。然而國家會根據輕重緩急來應對即將到來的還款期限。內債與外債有著差距極大的性質，因此當面臨違約風險時，國家會對他們採取不同的處理方式。


首先，借貸的來源不同，內債是國家向其國民借錢，並且是以本國貨幣計價，因此國家握有操弄幣值的優勢；外債則是來自境外的債權人，國家為價格的接受者，除非自身是出產硬通貨的國家，<sup>20</sup>否則幾乎沒有話語權。例如國家能夠透過金融壓制(financial repression)，像是強迫將儲戶的收益壓低至低於通貨膨脹率的標準，或是強迫銀行向公司與政府提供廉價貸款等資本管制的政策，降低國家對國內債務融資的成本，減少國家對內債的負擔(Aizenman, 2004; Reinhart & Sbrancia, 2015)。

21

其次，國家能有許多手段來規避掉積欠的內債，無論是用法律違約或是事實違約的方式。法律上的違約包含強制財產轉換(Forcible Conversations)、降低票面利率(Coupon rates)、減少本金(Principles)與中止支付來違反國內債務的契約條款；事實違約則是利用高通貨膨脹，對國內債務違約(Reinhart & Rogoff, 2009:65)。法律違約

<sup>20</sup>硬通貨是指來自擁有強大政府和經濟的國家的資金，並且不太可能失去其價值(Hörngren & Lindberg, 1993)。

<sup>21</sup> 其他金融壓制的政策：受控制的民眾直接借貸給政府、明確或隱晦的利率上限、跨境資本監管、政府與銀行的緊密連結、相對高的外匯儲備要求與交易稅、禁止黃金收購、閒置大量不可流通的政府債務(Casola & Sichlimiris, 2017)。



相較於事實違約，是成本較低的手段，因為通貨膨脹會大幅影響銀行體系與金融業(Reinhart & Rogoff, 2009:111)。更進一步說，政府還可以強迫被控制的市場以遠低於市場利率的價格吸收政府債務，來達到減債的效果(Reinhart & Rogoff, 2011)。然而在外債方面，國家僅能以劣勢的姿態與外國債權人進行債務談判，來處理即將違約的債款。

最後，內債違約對於部分債權人是有誘因的，例如政府會為了償還國內債款而提高稅收，若稅收增加率與政府償債不成比例，反而得不償失(Guembel & Sussman, 2009)。並且，內債違約能夠促進財產重分配的效果和增加社會福利，因為國內債務的升高可能降低債權人的重分配效果，讓部分人贖不回債款，高額的還債壓力也可能會壓縮若干社會福利的空間(D'Erasmus & Mendoza, 2021)。<sup>22</sup>對外國債權人來說，違約或其他債務減免手段只會侵害他們的債權。

事實上，學界對於內債違約的研究相當少，資料也不夠完整。從既有文獻可以推敲出國家在面對外債問題時更為脆弱與無力，國家沒有太多手段能夠處理不可持續性的外債，因此國家對外債有較低的負擔能力。Kohlschen(2010)透過實證研究發現外債違約很有可能會連帶使內債違約發生，他認為國際債權人可能比國內債權人對國際金融機構更有影響力，也能讓國內債權人一同分擔違約成本。Reinhart和Rogoff(2009:136)也指出關於戰後的實證研究中指出國家對於內債違約次數比外債次數高。因此，本研究將內債與外債區分開來，選擇以外債作為國家負擔的指標。

---

<sup>22</sup> 社會福利包含個人保險(Self-insurance)、流動性供給(liquidity-provision)與風險分擔(risk-sharing)，請看 D'Erasmus & Mendoza(2021)。

## 第二節 理論基礎與模型




延續上一節，本研究將提出一個模型假說來解釋國家的外債數量與國家衝突行為的關係。在高成本和平(Costly peace)的基礎上，結合 Slantchev(2012)的債務融資模型(Debt Financing model)與 Bueno de Mesquita & Lalman(1992)的和平鴿子(Pacific Doves)假說，提出一修正後的債務衝突假說，並以量化統計方式檢驗模型假說的效力。

### 壹、 理論基礎一：高和平成本與債務融資模型

在過往衝突研究的文獻中，Fearon(1995)提出一個議價模型(Bargaining Model)，以理性主義的視角為國家的戰爭行為做出解釋，他認為國家進行戰爭與衝突的代價很高，保持和平相對沒有成本損失，因此和平比起戰爭與衝突來說成本較為低廉，這之中一定存在議價的空間，可以使有利益爭議的兩國透過談判走向和平的結果。但他也提到，國家會因為承諾問題(Commitment problems)、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與不可分割議題(Issue indivisibilities)這三個情況使得議價空間被破壞，讓國家不得不做出成本高昂的衝突或戰爭行為。然而和平一直是零成本的嗎？只要戰爭與衝突一直保持高成本耗損，國家又能避免上述三個問題，國家之間是不是就能避免戰爭與衝突？

Coe(2012)提出另一種理性主義的解釋：「高成本和平(Costly peace)」，為戰爭與衝突的起源以不同的觀點做出解釋。他不但從成本層面考量，也從效益的角度來說明高成本和平，明確指出維持和平的手段在實務上不但代價高昂，且比起衝突與戰爭的效益還低。這種高成本與低效率的原因可能來自於備戰(Arming)、現況不滿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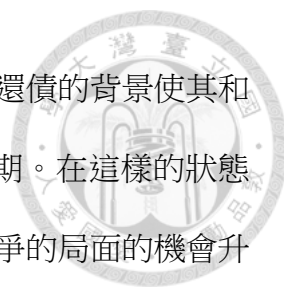
(Unsatisfied to current situation)、利益掠奪(Predation)與應對承諾問題和資訊不對稱的措施。<sup>23</sup>他認為在諸多衝突中的某些情況下，國家需要在和平時期付出巨大代價來克服承諾問題與資訊不對稱問題以規避戰爭，而戰爭卻可能為交戰的一方帶來福祉，並降低在和平時期付出的成本。

Slantchev(2012)基於 Fearon(1995)議價模型的框架，將借貸這個經濟因素納進衝突與戰爭，提出一個「債務融資模型」，關注債務國的衝突行為，提出若債務過高反而會使國家容易對外發動戰爭。Slantchev(2012)認為在假設資訊完整，並且不考慮承諾是否可靠的條件下，若一國家有還債壓力時，會讓其產生對外發動戰爭的誘因，衝突對象為任何國家，可能是其債權國或是毫無關係的國家，他表示因為在和平時期，國家必須要還債，但是一進入戰爭時期，國家就有理由延遲還債、甚至可能倒債。這就打破戰爭時期比和平時成本還要高的觀念，如此一來，對欠債的國家而言，和平時期關於債務的成本就反而比戰爭時期的債務成本高，形成高成本和平的局面。這個假設的另一個前提是，國家必須要是透過與第三方舉債來籌措戰備資源，以利與他國競爭或衝突，而且舉債的大小能反映出債務國的軍事投射能力，越大的軍事投射能力將能夠脅迫對手國給予更大的讓步，同時對終止戰爭產生影響。

可以說，Slantchev(2012)假設了國家戰敗會倒債的可能性，讓戰爭成本的計算不同於一般戰爭文獻，如果發動戰爭的成本低於平時累積的債務，則債務國更會樂於戰爭，因為債務只須在戰勝後再支付，而戰爭的勝利不僅可以讓債務國在國內問題上得到喘息，通常也能得到賠償等；而且若債務國戰敗則可能因為國家或政府重整以及經濟的更加惡化而採取直接債務違約的行為。在 Fearon(1995)的議價模型框架中，代價高昂的戰爭和無成本的和平假設必然存在議價的空間。而債務的存在打破

---

<sup>23</sup> 高和平成本的相關案例解釋請見 Coe(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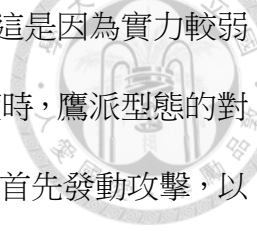


了這個狀態，背負債務的國家於和平時期不再是沒有成本，需要還債的背景使其和平時期的成本與戰爭時期一樣代價高昂，甚至可能超過戰爭時期。在這樣的狀態下，爭端國家之間的議價空間可能會消失，雙方走向衝突或是戰爭的局面的機會升高。因此，國家因為債務對外發動衝突與戰爭的傾向即符合理性主義者的假設範圍內。

## 貳、 理論基礎二：和平鴿子假說

若從發動戰爭時國家實力的考量來看，需要將金融資本轉化為軍事力量，因此一般會認為債務高築的國家沒有太多經濟資源可以為軍事預算所用，所以實力相對其他國家較虛弱，也較不願意涉入衝突與戰爭，甚至是主動挑起衝突與戰爭。然而 Bueno de Mesquita & Lalman(1992)卻提出一個違反直覺的假說，即實力弱小的國家是有可能主動對外發動衝突，當較為弱小的國家與他國實力差距越大，主動對外發動衝突的可能性就越大。換句話說，國家的實力大小與衝突發生的機率成反比線性關係。

這種關係體現在 Bueno de Mesquita & Lalman(1992)研究國內政治對國際互動的影響，為「和平鴿子假說(Pacific Dove Hypothesis)」。其核心論點是「兩個持有紛爭的國家，當一個國家的實力相較於對手國越弱，越容易向外發動衝突」(見於圖 3-1)，並透過 40 個案例檢驗假說的效力。根據他們的定義，和平鴿子國家至少具備三個特性：第一、其偏好「談判」大於「強迫對手國認輸」，即便對手國主動讓步，也會選擇談判，而不會脅迫對手國；第二、若遭受到攻擊時，偏好「直接認輸」大於「報復」；第三、和平鴿子如果不清楚對手國是偏向鴿派或是鷹派的型態，並且在自己相對弱小的情況下，與對手國的實力差距越大，反而有更高的可能性會向



對手國發起預防性攻擊(Preemptive attack)，以讓對手國認輸。<sup>24</sup>這是因為實力較弱的和平鴿子國家不清楚對手國的型態，會擔心當他持談判的態度時，鷹派型態的對手國會撕毀談判，向他發起攻擊，於是實力較弱的和平鴿子將會首先發動攻擊，以確實握有第一擊攻擊的優勢，進而避免這一態勢造成嚴重利益損失的風險。

整體來說，對於實力較弱的和平鴿子國家，唯一在紛爭中得到好處的方式是先發動攻擊，冒險假設(Gamble)認定實力較強的對手國是鴿派性質，將會在自己發動攻擊後的時間點對衝突情勢讓步或是直接認輸，不會反過來進行回擊或是實行報復行動。因為一般在國家間的談判過程中，一國的談判優勢通常是基於雙方的實力落差，這顯示實力較弱的和平鴿子國家對情勢的議價能力與預期利得會相對於另一方國家小。因此，若和平鴿子國家能夠透過先發動攻擊這種掌握主動權的「先發制人」策略，能夠讓先發動攻擊的他在衝突時間點後的談判過程上，讓對手國感受到其堅決到不惜動武的強硬態度，以及率先發動攻擊的結果，能同時成為和平鴿子國家的談判槓桿，進而增加其在談判桌上威嚇的信用與效度。然而，這種先發制人的攻擊策略也有可能反而讓談判無法進行，因為可能遭到對手國的反擊，和平鴿子國家能否最大化自身利益與優勢的關鍵，則是取決於對手國為鴿派或鷹派性質而定。

---

<sup>24</sup> Bueno de Mesquita 定義鴿派性質國家偏好與對手談判大於強迫對手認輸，或是在遭受到對手國攻擊時，偏好認輸；反之，鷹派性質國家偏好攻擊對手國大於進行談判，或在受到對手國攻擊時，偏好進行報復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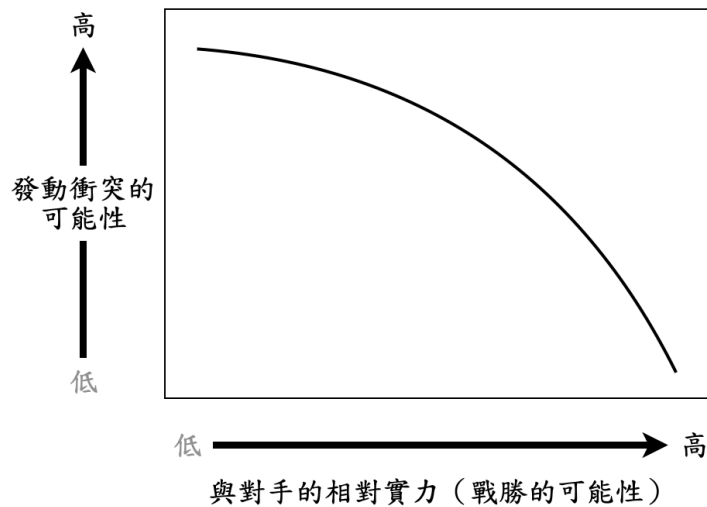


圖 3 - 1 和平鴿子自身實力與好戰程度


資料來源：修改自 (Bueno de Mesquita, 1994)

### 參、 債務衝突假說

「債務衝突假說」是建立在高成本和平的基礎上，同時結合 Slantchev(2012)的債務融資模型與 Bueno de Mesquita & Lalman(1992)的和平鴿子假說，提出一個並非以二元(Dyad)國家組合的視角，而是以國家單方面發動(Initiation)對外衝突視角的假說模型，作為本研究解釋外債與國家發動衝突行為之間運作機制的理論基礎。

此為債務衝突假說，同時見於圖 3 - 2：

當某一債務國家面臨不可持續性外債的總體經濟問題，該國可能要處理的不只是還債壓力，大量負債帶來的債務積壓效應、流動性限制、未來資源短缺與通貨膨脹等經濟負面影響，也須面對債權國透過外債債權所進行政治轉向或讓步等經濟國策的脅迫，甚至是債權國以債務償還義務為藉口的軍事干預、入侵等行動。這些種種壓力，使債務國迫切需要解決債務問題。因此，債務國向其債權國或是國際




金融組織進行新一輪的債務融資或債務減免的談判，往往作為其違約以外解決債務問題的手段。不可避免地，債務國作為價格的接受者(price-takers)，相對於外國債權人幾乎沒有話語權(Ballard-Rosa et.al., 2021)，債權國或是國際金融組織方，更會有條件的考量債務國的財政狀況與還款信用，來評估是否能給予債務國相關債務的優惠措施。若是債務國能執行與滿足債權國與國際金融組織方所提出的財政調整要求，自然能獲取新一輪融資或減免債務等債務重新安排(Debt rescheduling)。然而一般外債不可持續性的債務國通常不樂見自身的財政自主性受到境外干涉，或是擁有先天結構因素對財政調整的限制，這使新一輪融資或減免債務等安排窒礙難行。

於是，當上述情況發生時，依據 Slantchev(2012)的債務融資模型，這些債務國很大機會符合高成本和平的假設。因為維持和平的成本將可能高於衝突時期，而對外發動軍事衝突的行為能增加債務國提升與債主談判過程中話語權的機會，進而解決外債所帶來的諸多經濟與政治壓力。

在債務衝突假說中，債務國家主動發起對外衝突的目的，並非是希望獲得勝利，而是藉此嘗試向債權國或國際金融組織發出訊號。這個訊號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警示，因為與債務國相關的軍事衝突不但會影響投資者對債務國經濟的信心，造成債務國匯率與股價的下跌，同時加速惡化債務國的外債問題，更嚴重者，引爆外債危機與債務不履行(倒債)的情況。這個衝突帶來的後果，不但會讓債權國或是國際金融組織的債權暴露在高風險之中，甚至可能會嚴重擾亂國際經濟發展的正常秩序，讓世界金融體系陷入混亂中。

有許多研究尤其指出，軍事衝突與戰爭會直接對相關衝突國家內部的財政與經濟形成負面影響，同時會反映出人們預期對未來的經濟損失。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隨著戰爭前軍事衝突的碰撞，8 個歐洲國家的 20 種股票與債券的價值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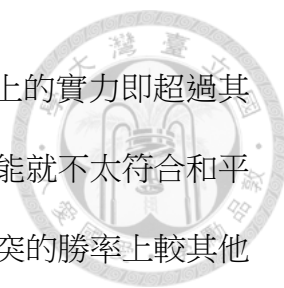
墜而下(Holsti & North, 1966)，5 個交戰國的貨幣大量貶值(Hall, 2004)。或是美國參與波斯灣戰爭的風險，影響了美國內部的金融市場(Rigobon & Sack, 2005)。又或是債券持有人特別厭惡衝突與戰爭帶來的總體經濟後果(Kirshner, 2007)，但比起已開發國家，他們對於發展中國家涉入國際衝突爭端反應更為悲觀(Lee, 2017)。國家間軍事衝突後所帶來的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等負面經濟影響，使債權國或是國際金融組織持有的債務價值會低於衝突前的實際價值，無疑讓他們損失大量收益。因此，本研究對國家對外衝突行為動機的假定(Assumption)為，債務國可能會透過對外發動衝突，釋放出相關訊號迫使債權國或是國際金融組織在債務的談判桌上讓步，無論是新一輪融資或減免債務。債務國對外發動軍事衝突的對象可以是任何對象，無論是他的債權國或是原本與他有紛爭的國家。

事實上，債務國在衝突前的談判，會因為累積的負債太多，以及不希望使債務惡化的心態，傾向避免涉入衝突，這就讓他站在被動的談判地位，使其難以在談判中勝出(Lee, 2017)。同時，諸多文獻也指出，國家的軍事動員能力需要依靠大量的經濟資源來轉換(Cappelen et al., 1984; Collier, 2006; Slantchev, 2012; Musayev, 2016; Zielinski, 2016)，一個國家若債務負擔極高，勢必會壓縮到經濟領域本身與其他領域的支出，該國的國家物質能力自然就相較其他國家弱小。<sup>25</sup>於是，本研究結合和平鴿子假說，認為債務國在發動衝突前，債務談判優勢與國家實力皆相較於債權國與國際金融組織弱小。唯有債務國透過對外發動軍事衝突，以及取得第一擊攻擊的優勢，增加自己與他們在債務談判中的議價能力。

此外，本研究在預設債務國實力皆會相較債權國較弱小的部分有其例外之處。亦即有若干債務負擔極大的國家將其所有外部借款集中用於提昇自身軍事力量，

---

<sup>25</sup> 衝突中國家實力通常是用軍事動員能力來衡量，且與戰勝的機會成正比，而軍動員能力需要依靠大量的經濟資源，因此若是外債負擔大的國家在衝突前的實力肯定沒有太多資源能轉換到軍事能力上，與對手國實力相比就會相對弱小。



而較少投入至其他領域。這些擁有大量軍力的國家在軍事衝突上的實力即超過其他債務國的實力，並可能拉近與債權國之間的差距。這些國家可能就不太符合和平鴿子假說中相對弱國的設定。進一步看，雖然這些國家可能在衝突的勝率上較其他債務國高，但這種作法，同時也增加還債的成本。對這些國家來說，若債務在可忍受範圍內，會避免參與衝突徒增財政負擔；反之，若債務超過一定的程度，比如到達不可持續性的程度，則會使這種國家變得更好戰(Lee, 2017)。如此一來，這些軍力強大的債務國對外債的反應，同樣會在面臨不可持續性的外債時，變得更具侵略性，與本研究的假設並無抵觸。換句話說，這兩種將外債用於不同地方的債務國，皆會在外債累積時盡量避免涉入衝突，使自身債務狀況更加惡化；但皆卻會在超過自身負擔底線後，對外發動衝突，奮力一搏。

由於本研究以和平鴿子的假說為基礎，因此本研究接受兩條件為前提：首先是預設債務國會冒險假設(Gamble)對外進行軍事衝突行為的對手國是鴿派性質的國家，因為這種性質的國將會在債務國發起衝突後讓步，債務國才会有冒險一試的動機。第一個條件將可能促使債務國增加自身與債權國或是國際金融組織在債務談判上的優勢。然而，若不幸攻擊的對手國為鷹派性質的國家，遭到對方反擊的同時，則債務國會直接投降。第二個條件是，預設債權國或國際金融組織會對債務國深陷軍事衝突所釋放出的警訊做出反應，為了保有自身的債權以及提高債務國還債的可能性，不得已在可能損失部分利益的情況下，於債務國發動衝突後，在債務談判桌上給予債務國讓步，或是其他能減緩債務國債務問題的協調。簡而言之，債務國透過對外發動軍事衝突的這個外部工具，試圖換取債權國與國際金融組織的讓步，翻轉衝突前其在他們面前極為弱小的議價能力。

延續上述，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檢驗一個國家的外債問題是否會使國家產生對外軍事衝突行為的動機？也就是上述的假說是否有效，國家是否會因為上述的機



制，使外債負擔太重的債務國向外發動衝突，也就是因為外債而更容易成為好戰者 (belligerent) ?

根據 Carmignani(2013)在非洲的研究，外債的累積對於發動戰爭確實有正相關的關係；Lee(2017)檢驗 56 個國家也發現，如果是對國家財政產生難以負荷的公共債務，對於國家發動戰爭也有正相關關係。因此，本研究欲檢驗兩種層次的衝突行為：軍事衝突層次以及戰爭層次，來論證其與債務的關係，如下述的假設一和假設二。

假設一：國家的外債越大，該國將會更偏向採取發動衝突的行為。

假設二：國家的外債越大，該國將更有可能發動戰爭。

另外，由於前述文獻指出軍事衝突會成為談判的外部選項，還有一個國家的軍事動員程度與其在談判桌上的槓桿成正比，同時先發制人的攻擊也能增加談判的力度。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推測，債務國會根據自身的外債壓力的高低，期望在談判桌上得到更多債權國或國際金融團體的讓步與援助。而債務國發起的軍事衝突規模越大，將越能反映其當下的軍事動員能力，以及其堅決不惜提高衝突規模的態度，向債權國與國際金融組織釋放更強警訊。故本研究提出第三個假設，也就是債務國可能會因為外債壓力的高低，增加對外衝突的規模大小。

假設三：國家的外債越大，越有可能增加其發動軍事衝突的規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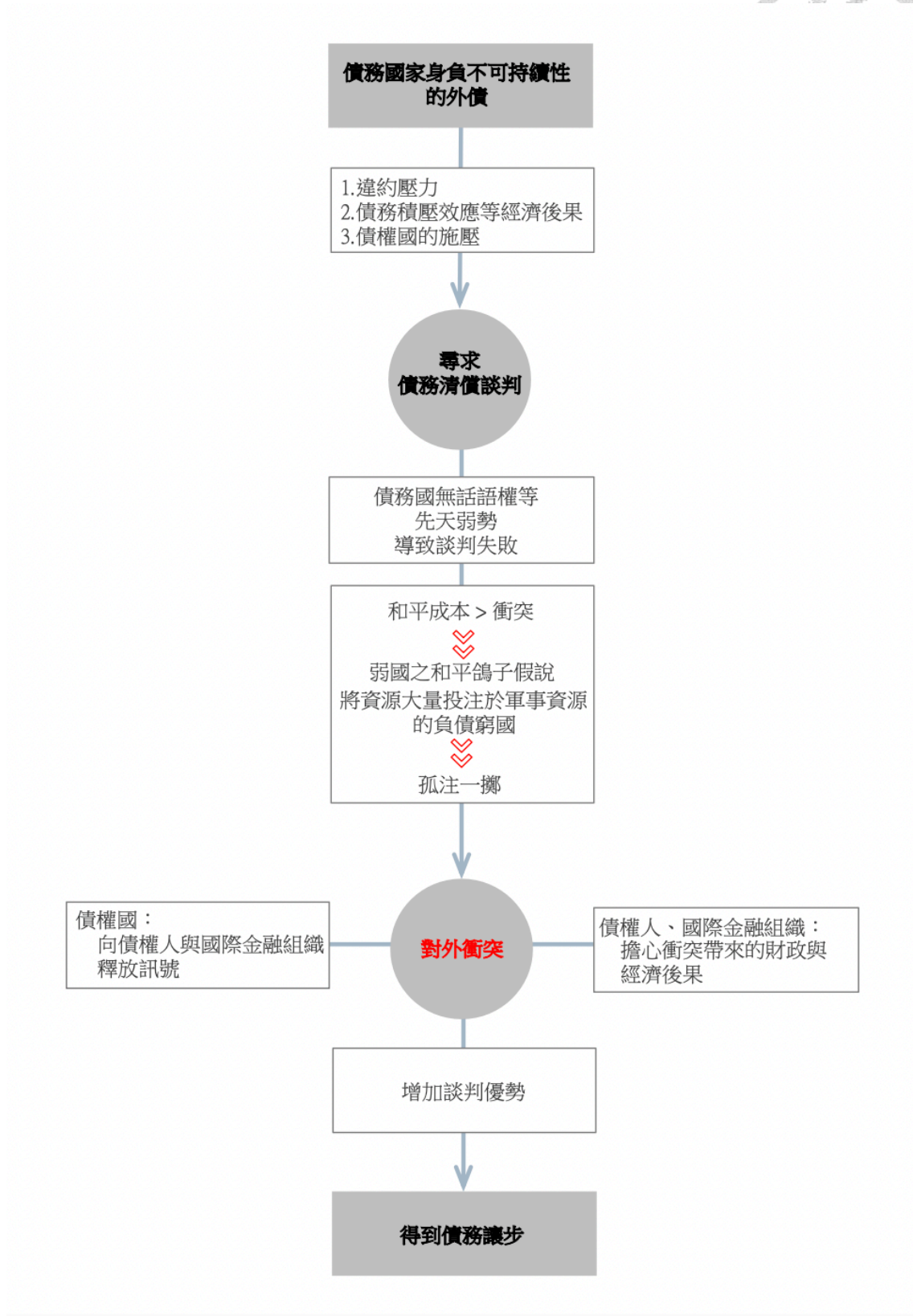


圖 3 - 2 債務衝突假說之機制



### 第三節 研究對象與資料來源

由於資料庫和時間的限制，本研究以世界上 192 個國家為分析對象，橫跨 1970 年至 2014 年，分析單位為「國家—年份」。而資料來源則主要來自兩個資料庫。戰爭與衝突資料來自戰爭相關性計畫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的「國家間軍事衝突資料庫」(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 Database)，其提供了自 1816 年至 2014 年國家間衝突的資訊(Palmer et al., 2020)。債務的資料是來自 Lane & Milesi-Ferretti(2018)的「國家的外部財富資料庫」(The External Wealth of Nations database)，這個資料庫提供 1970 年至 2020 年超過 200 個經濟體的外部財富資料，<sup>26</sup>包含外部資產(External Assets)、外部義務(External Liabilities)、外債義務(External Debt Liabilities)、外國直接投資義務(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iabilities)、國際投資部位(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等(Lane & Milesi-Ferretti, 2018)。

本研究選擇以 1970 年為起始點，原因是在這個時期以後才較有詳細分類的系統性債務資料庫，雖 1970 年以前有跨國跨時的公共債務資料庫，卻無外債或內債的分類；同時，以 2014 年作為樣本選擇的結束點，原因是戰爭與衝突資料缺乏從 2015 年至 2020 年的資料。另外，有部分國家例如古巴、北韓等國缺乏相關外債數據，故本研究將其排除。

<sup>26</sup> 這些經濟體包含國家與非國家實體，本研究只討論國家實體。



## 第四節 變項與測量

### 壹、 依變項

本研究的依變項有三個，分別是「衝突」、「戰爭」與「衝突規模」，這三個變項的數據取自「國家間軍事爭議」資料庫，根據其定義，國家間軍事衝突包括展示、威脅或使用武力對抗到真正戰爭的情況。其認定「衝突」為兩國或多國之間發生政府授權的「軍事化事件」(Militarize incident)，包含武力威脅、展示武力與使用武力，戰爭也包含於其中。而「戰爭」則是國家間持續的軍事戰鬥，造成了 1000 名以上因為戰鬥而死亡的官方軍事人員。「衝突規模」則是將不同的軍事衝突行為依照不同程度作連續的排定，從最輕微的武力威脅到最嚴重的參與戰爭。

在測量指標方面，「衝突」是以國家在該年是否主動向他國發起軍事衝突作為測量指標，以 1 或 0 表示，有發起衝突的年份編碼為 1，未發起衝突的年份編碼為 0。「戰爭」也是以 1 或 0 表示，有發起戰爭的年份編碼成 1，未發起戰爭的年份編碼成 0。「衝突規模」則是呈現一國與他國發生軍事衝突時，雙方衝突的規模大小，依照該年衝突規模的大小予以分數化，分數範圍從規模最小的標示為 1（無使用武力）、威脅使用武力(Threat to use force)標示為 2，3 為展示武力(Display of force)，使用武力(Use of force)為 4，規模最嚴重—參與國家間戰爭(Interstate War)—標示為 5。



## 貳、 自變項

本研究的主要解釋變項為「外債」，使用如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金融組織普遍用的測量指標—「外債義務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External Debt Liabilities to GDP Ratio)與「外債義務佔國家出口的比率」(External Debt Liabilities to Export Ratio)做為本研究的自變項。這兩者為國家對外債負擔壓力指標，若數值越大代表國家的負擔程度越大，越不能忍受外債累積。這種做法可以解決債務負擔上的定義問題，例如美國或日本等高收入國家，他們的借債量雖然龐大，但卻因為他們良好的經濟發展與鉅額的貿易收入，讓他們的外債負擔沒有如帳面上的外債數量那樣沈重，產生高外債低負擔的結果。

本研究使用的另一個指標是「外債義務數量」(External Debt Liabilities)，數值越大代表國家承擔更多的義務，需要向他國償還越多的債。若從國家必須償債的角度切入，外債的償還具有時限性，而且不像內債一樣可以透過一些金融手段解決，甚至可能在時限將至之前，透過新的借款償還舊債。若從國家金融流動性的角度觀察，過多的外債會產生債務積壓效應，使未來資金出現缺口，降低經濟表現。因此，一個國家若外債義務數量龐大時，也同時承受巨大壓力。

解釋變項的資料是根據 Lane & Milesi-Ferretti(2018)提供的外債數據與國內生產毛額數據以及世界銀行(2021)提供的國家出口資料進行計算。

表 3 - 1 外債負擔對各項依變項的預期迴歸係數方向

	外債對 GDP 的比率	外債對出口的比率	外債數量
衝突	正向	正向	正向
戰爭	正向	正向	正向
戰爭規模	正向	正向	正向




## 參、 控制變項

根據相關衝突研究的文獻，有至少六個因素對衝突會產生顯著影響，因此本研究將其設定為控制變項，以便找出債務對衝突發生的影響仍否具有顯著效果。

首先，根據自由主義中「貿易和平論」的命題，國家會因為兩國貿易的相互依賴程度增加，而降低雙方軍事衝突發生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貿易開放程度越高，越會產生和平的結果(Oneal and Russett 1997)。然而，Copeland(1996)卻對此命題提出一個相反的看法，他提出貿易預期理論(The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表示如果一個國家的對外貿易依賴越高，同時領導者對外來的貿易是悲觀的，擔心攸關自身命脈的商品會短缺，或是當前的貿易限制暫時不會緩解，則會發動衝突，確保物資進口，來保障自身長期的安全。不管貿易依賴程度可能是對衝突有正相關或負相關的影響，由於其有顯著影響，因此本文將之納為控制變項。貿易依賴程度的測量方式為進出口對 GDP 的比率，比率數值越高則代表一國的貿易依賴程度越高。相關資料取自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資料庫」(World Bank, 2014)。

第二，自由主義中的「民主和平論」觀點認為民主國家鮮少與另一個民主國家發生戰爭，這個觀點亦獲得 Maoz 與 Russett(1993)實證研究的支持。誠然，這個論點不保證民主國家不會向其他非民主國家發起衝突，但本研究認為其是個重要影響國家做出衝突行為的要素，因此納入控制。相關資料取自 V-Dem 的「自由民主指標」(Liberal Democracy Index)，編碼區間從最不民主的數字 0 到最民主的數字 1(Pemstein et al., 2022)。



第三，本研究控制了物質能力(Material Capabilities)，因為物質能力會使一個國家更有能力參與衝突或戰爭，甚至是決定開啟或終結爭端的決定因素(Bremer, 1992)。兩者的相關資料取自「國家物質能力資料庫」(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Database)(Singer et al., 1972; Singer 1987)。以「國家能力綜合指數」(Composite Index of National Capabilities)為指標，其由各國的軍事支出與人員、能源消耗、工業生產、總人口以及城市人口綜合加權而成，編碼介於 0 與 1 之間，數字越大代表國家物質能力越大(Singer et al. 1972; Singer 1987)，本研究將其轉換成對數。

第四，國家的地位大小可能與國家對外衝突行為有所連結。Bremer(1992)認為大國之所以能夠維持其地位是因為憑藉他們積極地干預主義，這些外交手段會使大國比小國來更容易對外發動衝突。因此本研究也將主要大國納入控制，資料來源來自「國家系統成員資料庫」(State System Membership Database)(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2017)。大國身份為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若一國家在該年度擁有大國身份則編碼成 1，其餘則編碼成 0。

第五，本研究控制國家的經濟發展。儘管在轉移注意力理論的相關文獻中，對國家的經濟狀況與國家對外衝突行為的因果關係有許多的辯論，國家經濟的狀況對於衝突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經濟發展的指標為經濟成長率，相關資料取自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數字越大代表國家在該年經濟發展越好(World Bank, 2021)。

最後，本研究將國家的聯盟納入控制的考量。Bueno de Mesquita(1982)與Bremer(1992)皆提出聯盟之間的衝突比起非聯盟國家之間更容易發生，這一點前者有做相關實證研究給予支持。相關資料取自聯盟條約義務和條款 (The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ATOP)，以聯盟國家數量作為指標，數量越多，代表聯盟國越多(Leeds et al., 2010)。

表 3 - 2 本研究各變項的操作定義與數據來源

變項	操作定義	數據來源
外債對 GDP 的比率	一國年度外債除以年度 GDP	The External Wealth of Nations database
外債對出口的比率	一國年度外債除以年度出口量	The External Wealth of Nations database, World Bank
外債數量	一國年度外債	The External Wealth of Nations database
衝突	虛擬變數，若該年度國家主動發起軍事衝突為 1，其餘為 0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戰爭	虛擬變數，若該年度國家主動發起戰爭為 1，其餘為 0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衝突規模	分為 5 個層級，未發生軍事衝突為 1、威脅使用武力為 2、展示武力為 3、使用武力為 4、戰爭為 5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貿易依賴	出口加上進口的總額除以 GDP，數值愈高，貿易依賴愈高	World Bank
國家政體	由 0 到 1 的連續分數，分數愈高愈民主	V-Dem
國家物質能力	由 0 到 1 的連續分數，分數愈高，國家物質能力愈大，轉換為對數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國家地位大小	虛擬變數，若該年度擁有大國身份為 1，其餘為 0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國家經濟成長	年度經濟成長率，若 數字愈大，則該年經 濟發展越好	World Bank
國家的聯盟	聯盟國數量	The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 第五節 分析方法

本研究在統計方法上使用 Mixed-effects complementary log-log regression 對本研究的假設 1 與假設 2 進行迴歸分析。由於假設 1 與假設 2 的依變項—軍事衝突與戰爭與否為二元變量，且依變項中沒有衝突與戰爭發生的次數遠大發生的次數，因此在統計方法上使用 Complementary log-log 迴歸模型來檢驗債務假設模型中外債大小與外債數量對軍事衝突、戰爭的相關性。Cameron & Trivedi(2006)指出當依變項資料的分配可能大量向 1 或 0 其中一處傾斜時，使用 Complementary log-log 迴歸在統計上可能會相對 Logit 或 Probit 迴歸還要合適。再者，本研究的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須確保發生前後的時間順序，因此，依變項為 t 年的資料時，自變項採計前一年(t-1)的資料，透過滯後(lag)依變項的變數作為對時間順序的控制。最後，在進行跨國跨時的比較研究時，會以隨機效果模型(Mixed-effects Model)來控制國家個體間未能觀察到的誤差項造成的變異。以下是迴歸模型分配：

$$\text{Complementary log - log } F(\mathbf{x}_i'\beta) = 1 - \exp\{-\exp(\mathbf{x}_i'\beta)\} \quad (1)$$



迴歸式 1 為類別變項迴歸， $\mathbf{x}_i$  為「外債對 GDP 的比率」、「外債對 GDP 的出口比率」與「外債數量」，以及若干「控制變項」； $\beta_0$  為常數項， $\beta$  為被預測（主要自變項與各控制變項）的迴歸係數； $\epsilon$  為誤差項。

除了二元變項的假設 1 與假設 2，本研究進一步探討假設 3—「外債大小與衝突規模的相關性」。由於假設 3 的依變項是 5 種次序分類的衝突規模，因此在統計方法上使用 McKelvey & Zavoina(1975)提出的序列機率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來檢驗。這個迴歸模型適用於性質為次序(ordinal)、分枝(polytomous)與分類(categorical)的，並按照一些基礎規模進行順序排列的依變項，而且亦不要求自變項為常態分配的分配假設(Liao, 1994)。由於在假設 3 的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一樣有時間前後的順序問題，因此也同樣延滯依變項變數一年作為對時間順序的控制。

以下是迴歸模型：

$$y_i^* = \alpha + \mathbf{x}_i^T \beta + \epsilon_i \quad (2.1)$$

$$y = \begin{cases} 0 & \text{if } y^* \leq 0, \\ 1 & \text{if } 0 \leq y^* \leq \mu_1 \\ 2 & \text{if } \mu_1 \leq y^* \leq \mu_2 \\ 3 & \text{if } \mu_2 \leq y^* \leq \mu_3 \\ \vdots & \\ 5 & \text{if } \mu_4 < y^* \end{cases} \quad (2.2)$$

迴歸式 2 為 Ordered Probit， $y_i^*$  為「衝突規模」（ $y_i^* = 1, y_i^* = 2, \dots, y_i^* = 5$ ）， $\mathbf{x}_i$  為「外債對 GDP 的比率」、「外債對 GDP 的出口比率」與「外債數量」，以及若干「控制變項」； $T$  為年份； $i$  為國家； $\beta$  為被預測（主要自變項與各控制變項）的迴歸係數； $\epsilon_i$  為不可觀察的誤差項； $\mu$  為各個閾值的分切點。



## 第四章 分析結果

### 第一節 敘述統計分析

關於本研究的依變項的分布之敘述統計詳見表 4 - 1。根據「國家一年份」為單位的母體樣本有 192 個國家共 7874 筆資料，「衝突」這個依變項來看，發生衝突的占 1070 筆，未發生衝突占 6804 筆；「戰爭」這個變項則是發生戰爭的占 36 筆，未發生戰爭占 7838 筆。從資料來看，國家主動涉入衝突的次數相當少，僅佔全體的 13.5%，主動挑起戰爭(Initiation of War)的更少，僅佔全體的 0.45%。在可以得到的樣本中，國家主動挑起衝突的數量比戰爭多 30 倍，可以初步推定國家間衝突與戰爭並非常態，相比衝突，國家更會避免戰爭的發生。

在另一個依變項「衝突規模」的部分，如表 4 - 2 所示，1070 筆的衝突發生樣本中，衝突規模 2 的威脅使用武力有 44 筆，佔全體衝突樣本 4.1%；衝突規模 3 的展示武力有 317 筆，佔全體衝突樣本 29.6%；衝突規模 4 的使用武力有 673 筆，佔全體衝突樣本 63%；最後，衝突規模 5 的參與戰爭有 36 筆，佔全體衝突樣本 3.3%。可以發現國家在進行衝突行為時，普遍使用的手段為使用武力與展示武力，合計佔據超過 90%，最常使用的手段則是使用武力。

表 4 - 3 是解釋變項的部分，有 3 組自變項與 6 組控制變項，原則上需各有 192 個國家包含 7874 筆資料，然而由於有部分遺漏值的出現，導致迴歸模型中的觀察值與總資料並不一致。首先，若從債務負擔的層面出發，且以外債對 GDP 的比率作為衡量指標，平均大約落在 GDP 的 0.98 倍，巴哈馬的負擔最大，其外債數量超過 GDP 的 60 倍；若以外債占出口為指標，一樣是巴哈馬的負擔最大，其外債數

量超過出口的 160 倍。另外，若觀察取完對數的外債數量，則可以發現美國的外債數量 7.17 為世界最多，高於平均 3000 倍，而其債務負擔若以外債對 GDP 比率來呈現，則只有低於平均的 0.89，顯示高外債國家不代表對數量龐大的外債感到壓力，而無法承擔。<sup>28</sup>

表 4-1 依變項—「衝突」的敘述統計分析

	衝突	戰爭
有發生	1070	36
未發生	6804	7838
所有個案數	7874	7874

表 4-2 依變項—「衝突規模」的敘述統計分析

衝突規模	數量	比例
規模 1—無使用武力	6804	-
規模 2—威脅使用武力	44	4.1%
規模 3—展示武力	317	29.6%
規模 4—使用武力	673	63%
規模 5—戰爭	36	3.3%

<sup>28</sup> 作者使用指數將取對數後的數值還原成原先的數值，所以美國取對數後的外債數值與平均值之差 3.49，約莫是 3000 倍。



表 4-3 各項解釋變項的敘述統計分析

	平均值	標準差	中位數	最小值	最大值	觀察值
外債占 GDP	0.98	0.04	0.40	0.0	61	7673
外債占出口	3.26	0.12	1.62	0.0	163.2	6051
外債數量 (log)	3.68	0.01	3.69	-0.54	7.17	7034
貿易依存度 (%)	76.6	0.61	66.5	0.02	437.3	6107
政體指數	0.34	0.003	0.25	0.005	0.896	6845
經濟成長(%)	3.75	0.07	3.88	-64.07	149.9	6901
國家能力指 數(log)	-3.16	0.012	-3.08	-6.61	-0.64	7484
聯盟數量	4.56	0.071	3	1	54	6509
大國身份	-	-	-	0	1	7874



## 第二節 迴歸結果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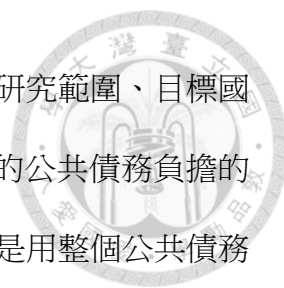
### 壹、 外債負擔與衝突、戰爭的關聯性分析

根據本研究的統計結果，國家的外債負擔程度與衝突的發生有相關性，如表 4-4 與表 4-5 所示。這些表格提供了 Mixed-effects complementary log-log 迴歸的結果、包含各個變項的勝算比、標準誤、平均邊際效果與顯著性。當勝算比的係數大於 1 時，代表某變項單位增加 1 單位，會使衝突發生的勝算提高若干倍。

首先，模型 1 與模型 3 分別使用兩種衡量國家外債負擔程度的指標：「外債對 GDP 的比率」以及「外債對出口的比率」，皆顯示在 95% 的信心水準下，債務的負擔程度對衝突的發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模型 1 外債對 GDP 比率的平均邊際效果同時指出，當比率上升 10 單位時，衝突發生的機率會上升 9%，見於圖 4-1；同理，當模型 3 外債對出口比率上升 10 單位時，衝突發生的機率會上升 4%，見於圖 4-2。換句話說，外債負擔程度的上升，會提高國家對外發動衝突的可能性。

圖 4-3 與圖 4-4 分別說明模型 1 與模型 3 的預測概率(Predict Probability)，當外債對 GDP 比率從 10 倍上升到 30 倍時，衝突發生的機率會從 18.75% 上升到 63%；而當外債對出口比率從 25 倍上升到 75 倍時，衝突發生的機率會從 20% 上升至 75%。也就是說，預測概率的結果同樣指出，外債負擔對衝突發生有正向影響。

其次，模型 2 與模型 4 在 95% 的信心水準下，結果皆指出外債負擔無論使用哪種指標測量，與戰爭的關係皆無法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顯示外債負擔的上升，並無法影響國家的戰爭行為。這與 Lee(2017) 做的相關實證研究不符合，本研究進一步觀察模型 2 與模型 4 的其餘變項，發現除了控制變項的顯著性相對小外，他



們的邊際效果都相當微小。本研究初步推估應該是 Lee(2017)的研究範圍、目標國家以及變項設計與本研究的差異所致。Lee(2017)雖然指出一國的公共債務負擔的上升會影響該國的戰爭行為，卻並無區分外債與內債之差異，而是用整個公共債務的負擔程度去測量對戰爭發動的效果，國家對內外債的負擔程度不一的前提，會使衡量實際債務負擔失去準確性；而且 Lee(2017)在衡量債務負擔時，是使用利率的概念，其認為利率越高且債務越多的狀況下，國家的債務負擔則越重。然而這種忽略使用以一國的 GDP 與出口等國家還債能力指標的做法，不免讓國家的債務負擔程度失真。

控制變項的部分，有顯著性的變項皆符合本研究的預測，越民主、物質能力越高和越多聯盟的國家，與衝突的發生有正向關聯性。然而貿易依存在各個模型中雖然呈現負向關係，但卻是皆不顯著，而且效果極小，原因可能在高度貿易互賴的全球化世界中，無論有無發生衝突或是戰爭，貿易仍然會持續進行。大國身份的部分，則只在模型 4 顯著，顯示大國相對於低層級的衝突，較容易深陷戰爭中。

整體來看，分析結果確實是符合假設一的假設一「國家的外債越大，該國將會更偏向採取發動衝突的行為」。無論從兩個對外債的負擔衡量指標，外債對 GDP 的比率與或是外債對出口的比率，都對國家對外衝突呈現正向的效果。然而假設二一「國家的外債越大，該國將更有可能發動戰爭」，則與本研究的分析結果不相符。按照國際實踐，二戰後，若干集體安全國際建制的蓬勃，還有戰爭已成為非法外交手段的規範，實質上使戰爭發生的機會大幅降低，儘管仍有戰爭發生的可能，但卻十分稀少。然而依照本節第參部分的分析，戰爭因為外債負擔而發生在邏輯上相關的可能性還是存在，但在實證上只有存於極端的情況下。



表 4-4 外債對 GDP 的比率對衝突發生影響的迴歸估計結果

	模型 1 衝突		模型 2 戰爭	
	勝算比 (標準差)	邊際效果	勝算比 (標準差)	邊際效果
外債對 GDP 的比 率	1.082** (0.029)	0.009	1.075 (0.360)	0.000
貿易依存度 (%)	0.997 (0.001)	-0.000	0.988 (0.011)	0.000
政體指數	0.403*** (0.233)	-0.111	0.163 (1.099)	-0.006
經濟成長	0.990 (0.007)	-0.001	1.043 (0.022)	-0.000
國家能力指 數(log)	2.605*** (0.132)	0.117	3.647* (0.568)	0.004
聯盟數量	1.461*** (0.009)	0.004	0.905 (0.059)	-0.000
大國身份	1.724 (0.337)	0.066	6.688 (0.985)	0.006
常數	2.055 (0.388)		0.251 (1.304)	
觀察值	4863		4863	

註：\* $p < 0.05$ , \*\* $p < 0.01$ ,  $p < 0.001$ \*\*\*



表 4 - 5 外債對出口的比率對衝突發生影響的迴歸估計結果

	模型 3		模型 4	
	衝突		戰爭	
	勝算比 (標準差)	邊際效果	勝算比 (標準差)	邊際效果
外債對出口 的比率(%)	1.037*** (0.009)	0.004	1.041 (0.039)	0.000
貿易依存度 (%)	0.999 (0.001)	-0.000	0.996 (0.008)	-0.000
政體指數	0.407*** (0.231)	-0.109	0.135* (0.845)	-0.007
經濟成長	0.989 (0.006)	-0.001	1.030 (0.042)	-0.000
國家能力指 數(log)	2.646*** (0.131)	0.120	3.755** (0.512)	0.005
聯盟數量	1.040*** (0.009)	0.004	0.917 (0.048)	-0.000
大國身份	1.625 (0.341)	0.059	6.19* (0.840)	0.007
常數	1.799 (0.379)		0.287 (1.210)	
觀察值	4811		4811	

註：\* $p < 0.05$ , \*\* $p < 0.01$ ,  $p < 0.001$ \*\*\*



95%信心水準下外債對GDP的比率對衝突發生的平均邊際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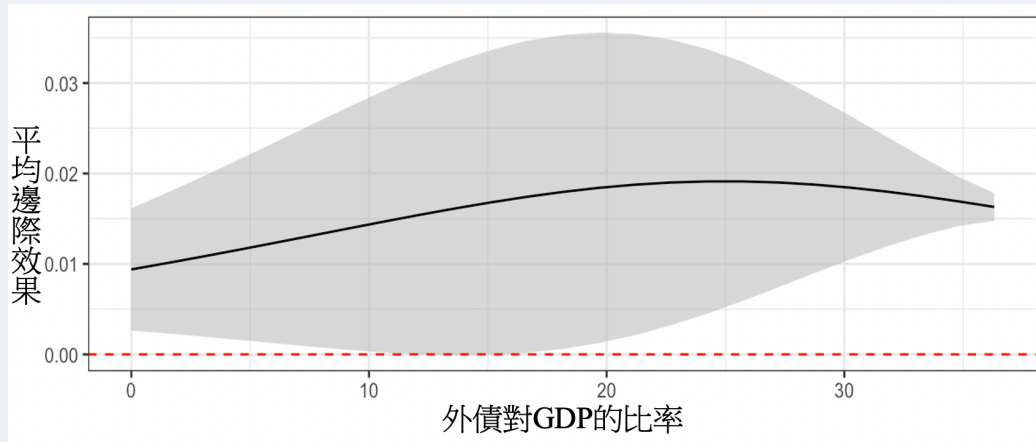


圖 4 - 1 外債對 GDP 的比率對衝突發生的平均邊際效果

95%信心水準下外債對出口的比率對衝突發生的平均邊際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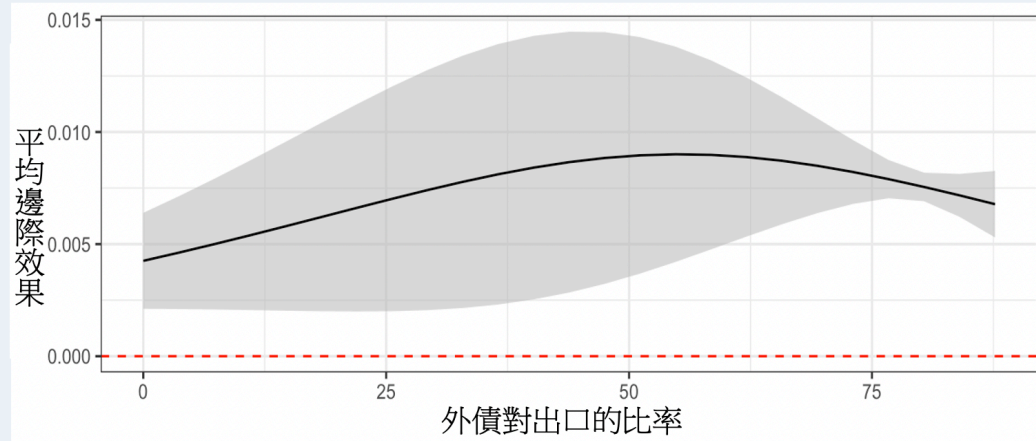


圖 4 - 2 外債對出口的比率對衝突發生的平均邊際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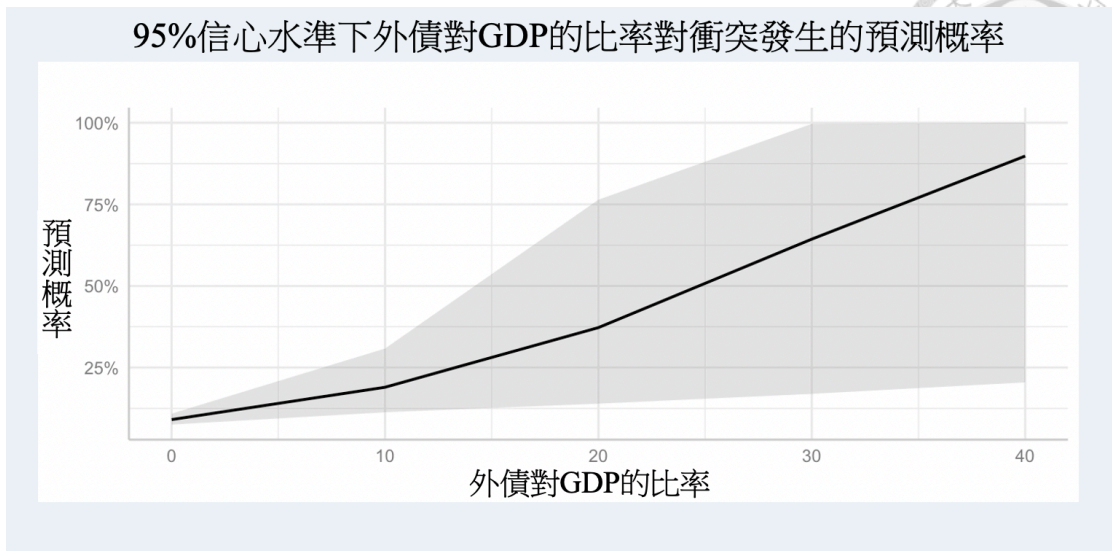


圖 4 - 3 外債對 GDP 比率對衝突發生的預測概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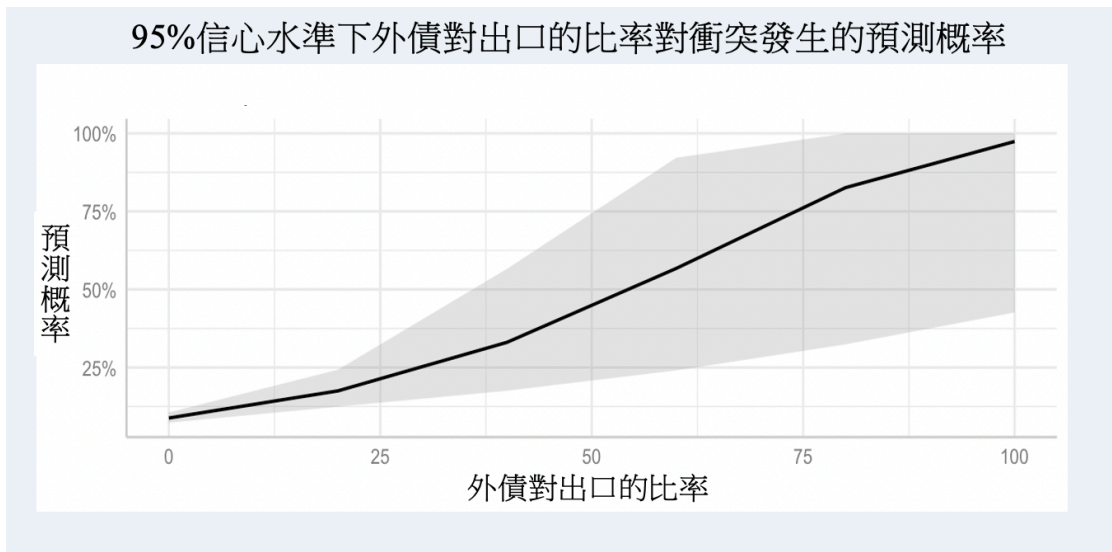


圖 4 - 4 外債對出口的比率對衝突發生的預測概率




## 貳、 外債數量與衝突、戰爭的關聯性分析

表 4-6 顯示「外債數量」對衝突相關性的分析結果。模型 5（衝突模型）與模型 6（戰爭模型）顯示出與上一節使用「外債負擔」作為自變項測量指標的模型之相似結果。同樣地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外債數量對衝突發生具有正向的顯著影響，對戰爭的發生則無顯著影響。若從平均邊際效果的角度來看，模型 5 外債數量對衝突發生的平均邊際效果為 0.039，意即當上升 1 單位時，衝突發生的機率會上升 3.9%，見於圖 4-5。

然而，部分高所得、高外債國家由於其可承擔的債務水平可能無法透過債務數量，精準反映出該國的債務負擔情形，繼而產生對於債務負擔的偏誤，故本研究針對目標 192 個國家，根據世界銀行定義篩出中等偏下與低收入等 78 個國家，並單獨進行迴歸分析，觀察這些國家是否也是符合債務負擔對衝突具有正向的顯著影響。因為這些國家普遍收入都較低，經濟活動也較差，外債數量或許便足以顯現他們外債負擔程度。模型 7 是以這 78 個國家作為研究範圍的模型，迴歸結果顯示中等偏下與低收入國家的外債數量也對衝突發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且其 0.062 的平均邊際效果比原本涵括所有國家的模型 5 的平均邊際效果還要好。也就是說，當外債數量上升 1 單位，中等偏下與低收入國家的衝突機率會比全體國家多上升 2.3%，見於圖 4-5、圖 4-6。此外，中等偏下收入與低收入國家的這個組別的債務與發動戰爭在統計上也無顯著性相關，結果與納入全體國家的模型 6 相似。

圖 4-7、圖 4-8 則從預測概率的視角討論債務數量對衝突發生的影響，當全體國家的債務數量從單位 2 上升至單位 6 時，衝突發生的機率會從 5% 上升到 17.5%；而中等偏下收入與低收入國家的債務數量從單位 2 上升至單位 6 時，衝突發生的



機率會從 3.5% 上升到 28%。平均邊際效果與預測概率皆揭示了外債數量有顯著提升衝突發生的效果。可以說，模型 7 較模型 5 更為突出的平均邊際效果與預測概率，使債務數量這個指標不僅符合本研究的假設與預期，並且能夠避免高外債低負擔的偏誤。透過這種依照國家收入水準將國家分組的方式，可以使這個指標與學界常用的外債對 GDP 的比率與外債對出口的比率這兩個衡量外債負擔的指標有異曲同工的效果，但衡量的效果是否能夠比擬這兩個指標，或甚至比他們更為精準，可能就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才可確認。

整體來說，透過模型 5 與模型 7 的研究結果發現也符合假設一「國家的外債越大，該國將會更偏向採取發動衝突的行為」。而且透過將國家分組，更能直觀地反映出本研究以和平鴿子為理論基礎做出的債務衝突假說，對於中等偏下與低收入的家，當他們外債越多，代表他們國家的實力可能就越弱，比起中高收入卻重債的家，有更高的可能性對外發動衝突。然而，與前一部分模型 2、模型 4 的結果一樣，用外債數量這個指標衡量外債負擔大小仍然不符合假設二的假設，亦即國家的外債數量對發動戰爭就本研究的分析上，並沒有統計上的相關性。

表 4 - 6 外債數量對衝突與戰爭發生影響的迴歸估計結果

	模型 5 衝突 (全體國家)		模型 6 戰爭		模型 7 衝突 (中等偏下與低收入國家)	
	勝算比 (標準差)	邊際 效果	勝算比 (標準差)	邊際 效果	勝算比 (標準差)	邊際 效果
外債數量	1.388*** (0.090)	0.039	0.650 (0.474)	-0.001	1.700** (0.165)	0.062
貿易依存 度(%)	0.996* (0.001)	-0.000	0.992 (0.011)	0.000	0.988** (0.003)	-0.001
政體指數	0.277*** (0.265)	-0.155	0.229 (1.332)	-0.004	0.245* (0.695)	-0.165
經濟成長	0.992 (0.007)	-0.000	1.038 (0.028)	0.000	0.997 (0.010)	-0.000
國家能力 指數(log)	1.975*** (0.150)	0.082	5.35* (0.676)	0.005	1.024* (0.014)	0.002
聯盟數量	1.027** (0.010)	0.003	0.881 (0.070)	-0.000	0.973 (0.030)	-0.003
大國身份	1.636 (0.347)	0.059	10.59* (1.05)	0.007	-	-
常數	0.359 (0.606)	-	2.999 (2.807)	-	0.035*** (0.584)	-
觀察值	4763		4763		1963	

註：\*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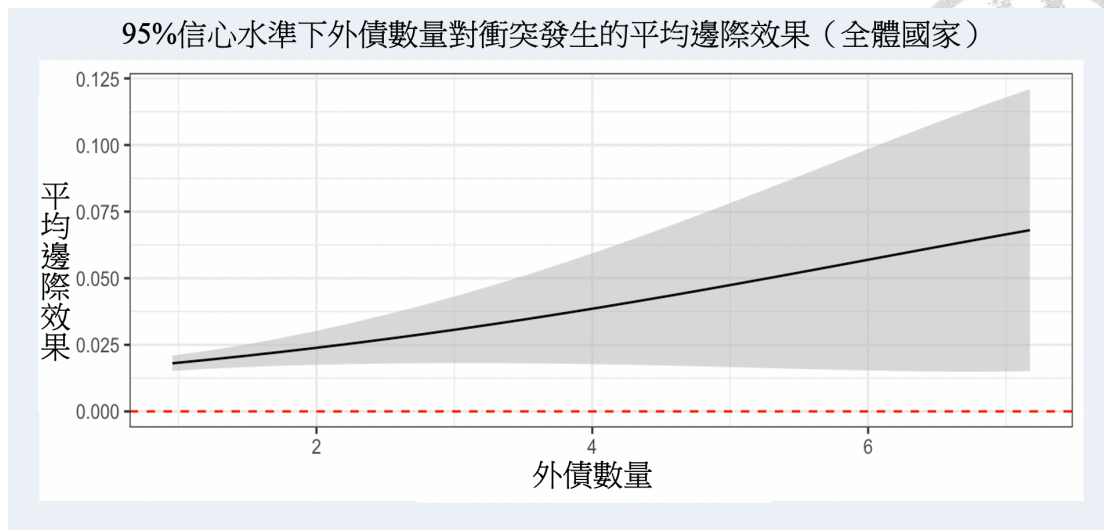


圖 4 - 5 外債數量對衝突發生的平均邊際效果（全體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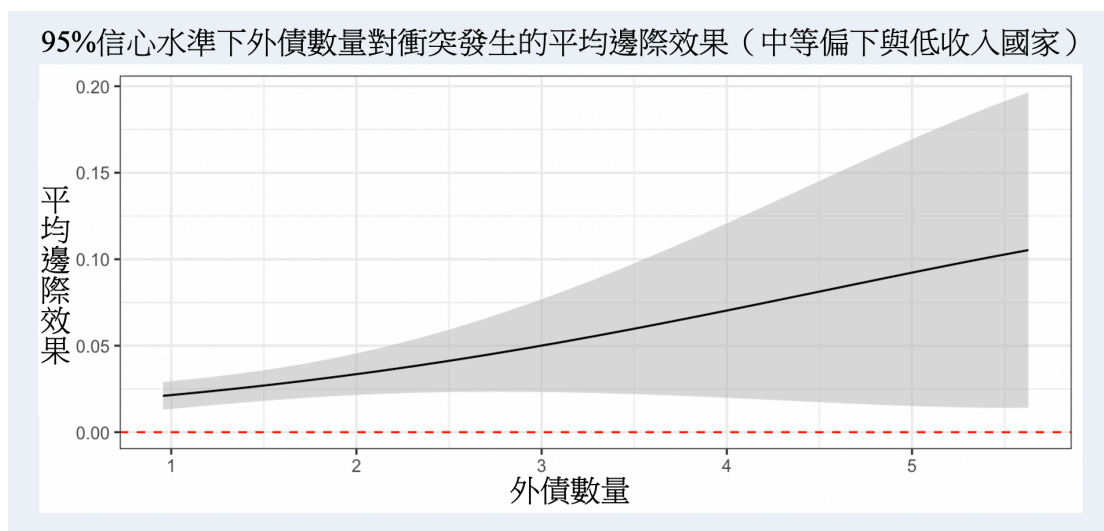


圖 4 - 6 外債數量對衝突發生的平均邊際效果（中等偏下與低收入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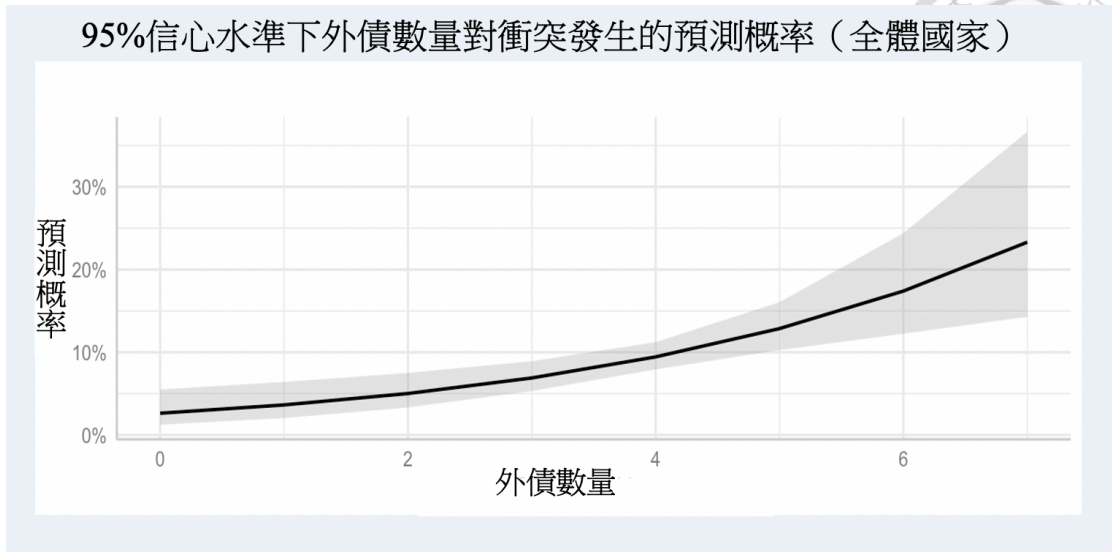


圖 4 - 7 外債數量對衝突發生的預測概率（全體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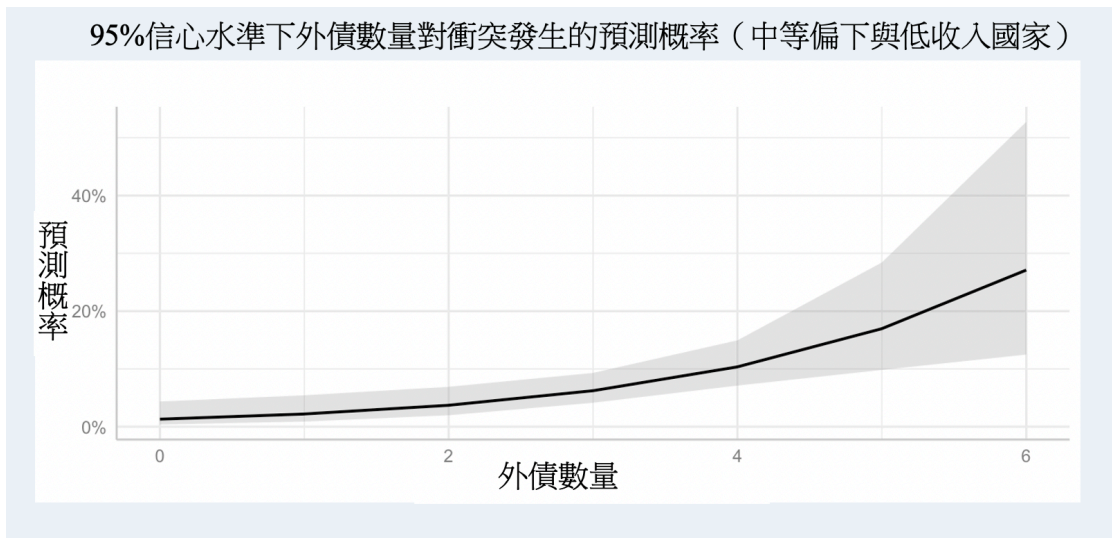


圖 4 - 8 外債數量對衝突發生的預測概率（中等偏下與低收入國家）



### 參、 外債負擔、數量與衝突規模的關聯性分析

根據本研究對第三個假設進行迴歸分析後的結果，國家的外債負擔程度與衝突規模的提升有其關聯性，如表 4-7 所示。表 4-7 提供了序列機率模型迴歸的結果，包含各個變項的相關係數、標準差與顯著性。無論是使用哪種測量指標—「外債對 GDP 的比率」、「外債對出口的比率」或是「外債數量」，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皆達到統計顯著性，外債的上升能使衝突規模隨之上升。

表 4-8 表示外債在不同規模層級的邊際效果，由於邊際的影響效果是指機率，因此各個模型中的邊際效果總和為 0。首先，拿模型 8 為例子，當外債對 GDP 比率上升 1 單位時，一國會減少 0.89%的可能性採取規模 1「無使用武力」，增加 0.03%的可能性執行規模 2「威脅使用武力」，增加 0.24%的可能性執行規模 3「展示武力」，增加 0.58%的可能性執行規模 4「使用武力」，與增加 0.02%的可能性執行規模 5「戰爭」。同理模型 9，當外債對出口的比率上升 1 單位時，一國會減少 0.4%的可能性執行規模 1，增加 0.01%的可能性執行規模 2，增加 0.11%的可能性執行規模 3，增加 0.27%的可能性執行規模 4，與增加 0.01%的可能性執行規模 5。最後模型 10，當外債數量上升 1 單位時，一國會減少 2.7%的可能性執行規模 1，增加 0.1%的可能性執行規模 2，增加 0.74%的可能性執行規模 3，增加 1.78%的可能性執行規模 4，與增加 0.08%的可能性執行規模 5。

上述依據不同外債負擔指標呈現出的效果，皆指出外債的上升會有衝突規模遞增的效果，因為外債的上升會使國家執行規模 1「無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下降，同時，使國家執行其餘規模的可能性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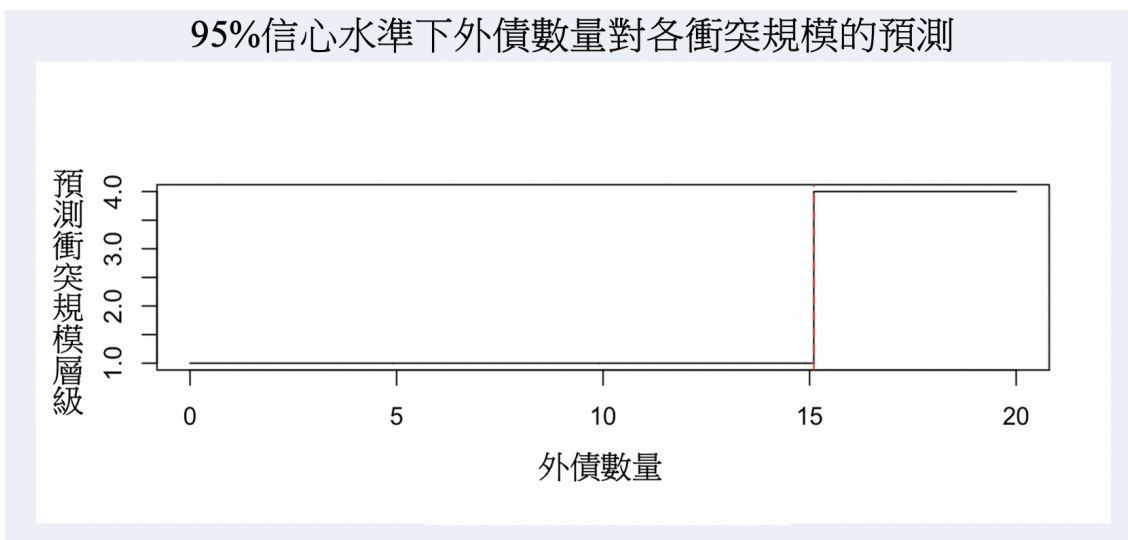
此外，本研究進一步探討模型 8—以外債對 GDP 的出口比率作為自變項—來預測各規模層級的概率。根據圖 4-9，當一國的外債對 GDP 比率為 50 時，其衝



突規模 1 的機率為 18.75%，衝突規模 2 的機率為 1%，衝突規模 3 的機率為 11%，衝突規模 4 的機率為 64%，以及衝突規模 5 的機率為 5.25%。如果外債對 GDP 比率從 12.5 上升到 37.5 時，可以發現衝突規模 1 的機率降低了 42%，而衝突 3 與衝突 4 的機率分別上升了 7%與 35%。這些規模層級概率的增減也說明了，當外債增加時，維持和平的可能性會隨之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各衝突規模層級的可能性上升。

具體來說，圖 4 - 10 將機率 50%作為國家最可能進入的衝突規模層級的門檻，顯示不同程度外債的衝突規模落點。當一國的外債對 GDP 比率低於 35 時，該國最有可能不使用任何武力；比率超過 35 時，最有可能位於規模 4 使用武力的位置；而當比率到達 85 時，則最有可能進入戰爭。而從圖 4 - 10 來看，幾乎無法找到規模 2 與規模 3 的進入門檻，但若對照圖 4 - 9，則規模 2 與規模 3 也是會發生，只不過在外債對 GDP 比率 35 以下時，規模 1 發生的可能性更高。

同樣的，在模型 9 的預測概率在本研究的分析中，也與模型 8 得到相似結果，見於圖 4 - 11 與圖 4 - 12。然而在模型 10，雖然外債數量的上升確實可能使衝突規模 3 與衝突規模 4 的機率有增加的效果，但效果相對不明顯，見於圖 4 - 13，而且



顯示，在外債數量大於 15 的情況下，衝突規模 4 的機率大小才會超過衝突規模 1 的機率大小。

整體來說，本研究透過模型 8、9、10 中外債大小對衝突規模層級的邊際效果與預測概率，清楚顯示出外債的上升確實可能使衝突規模隨之上升。這不但符合本研究假設三的假設—「國家的外債越大，越有可能增加其發動軍事衝突的規模」，更是扣回本研究最重要的命題，國家外債的增加會使其偏向採取發動衝突的行為。

最後，模型 8、9、10 的控制變項部分，政體、國家能力與聯盟數量也具有統計顯著性，他們的方向性與本研究的預期相同，越民主的國家、國家能力越強的國家或是聯盟數量越多的國家，會更有可能使衝突規模上升到更高層級。然而在這三個模型中，貿易依存的方向性雖然與模型 1、3、5 的方向性一樣，皆是負的，卻具有顯著性，原因可能是如貿易和平論的核心概念，基於貿易互賴，不希望衝突規模的上升導致貿易條件與貿易環境惡化。

表 4 - 7 外債大小對衝突規模上升影響的迴歸估計結果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相關係數 標準差	相關係數 標準差	相關係數 標準差
外債對 GDP 的比率	0.076*** (0.023)	-	-
外債對出口 的比率	-	0.034*** (0.009)	-
外債數量	-	-	0.230** (0.087)
貿易依存度 (%)	-0.004** (0.001)	-0.002 (0.001)	-0.004** (0.001)
政體指數	-1.035*** (0.152)	-1.018*** (0.151)	-1.306*** (0.197)
經濟成長	-0.010 (0.007)	-0.012 (0.007)	-0.010 (0.008)
國家能力指 數(log)	1.040*** (0.074)	1.086*** (0.075)	0.854*** (0.102)
聯盟數量	0.028*** (0.006)	0.027*** (0.006)	0.026*** (0.006)
大國身份	0.262 (0.174)	0.218 (0.175)	0.237 (0.179)
區間 1-2	-1.520*** (0.210)	-1.486*** (0.209)	-0.232 (0.515)
區間 2-3	-1.454*** (0.210)	-1.420*** (0.209)	-0.165 (0.515)
區間 3-4	-1.923*** (0.210)	-0.886*** (0.209)	0.371 (0.515)
區間 4-5	2.676*** (0.310)	2.650*** (0.305)	3.987*** (0.567)
觀察值	5070	5038	4937

註：\* $p < 0.05$ , \*\* $p < 0.01$ ,  $p < 0.001$ \*\*\*

表 4 - 8 外債大小對衝突規模上升影響的邊際效果

	外債對 GDP 的比率 (模型 8)	外債對出口的比 率 (模型 9)	外債數量 (模型 10)
	邊際效果	邊際效果	邊際效果
規模 1	-0.0089	-0.0040	-0.0270
規模 2	0.0003	0.0001	0.0010
規模 3	0.0024	0.0011	0.0072
規模 4	0.0058	0.0027	0.0180
規模 5	0.0002	0.0001	0.0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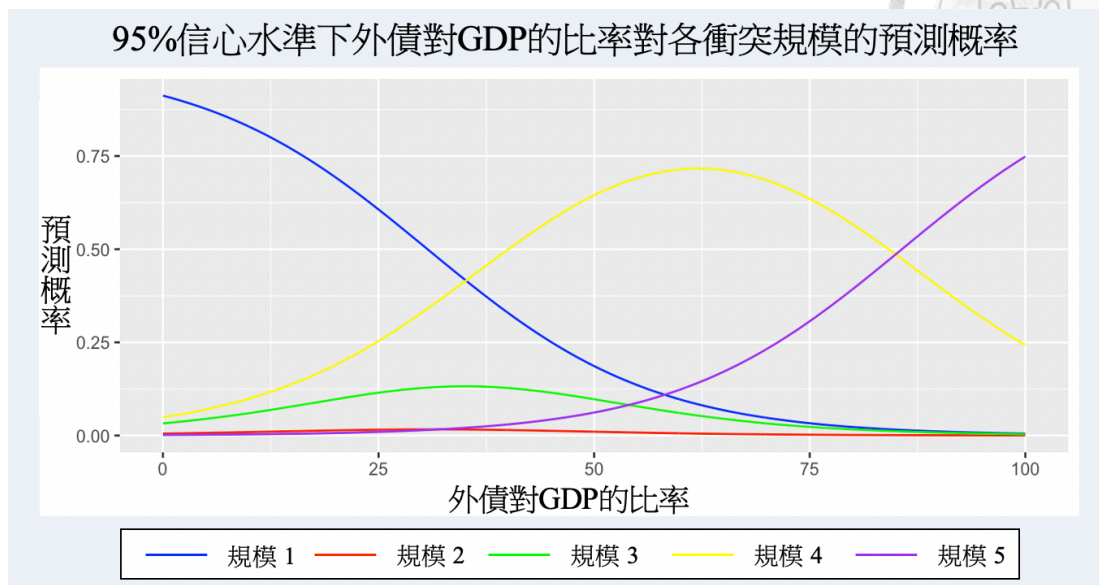


圖 4 - 9 「外債對 GDP 的比率」對各衝突規模的預測概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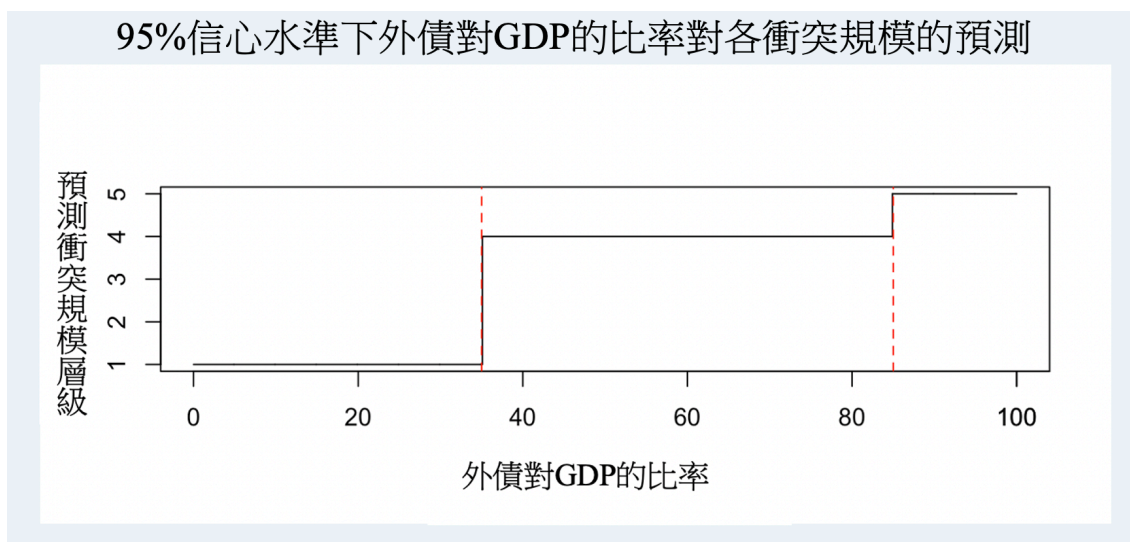


圖 4 - 10 「外債對 GDP 的比率」對各衝突規模的預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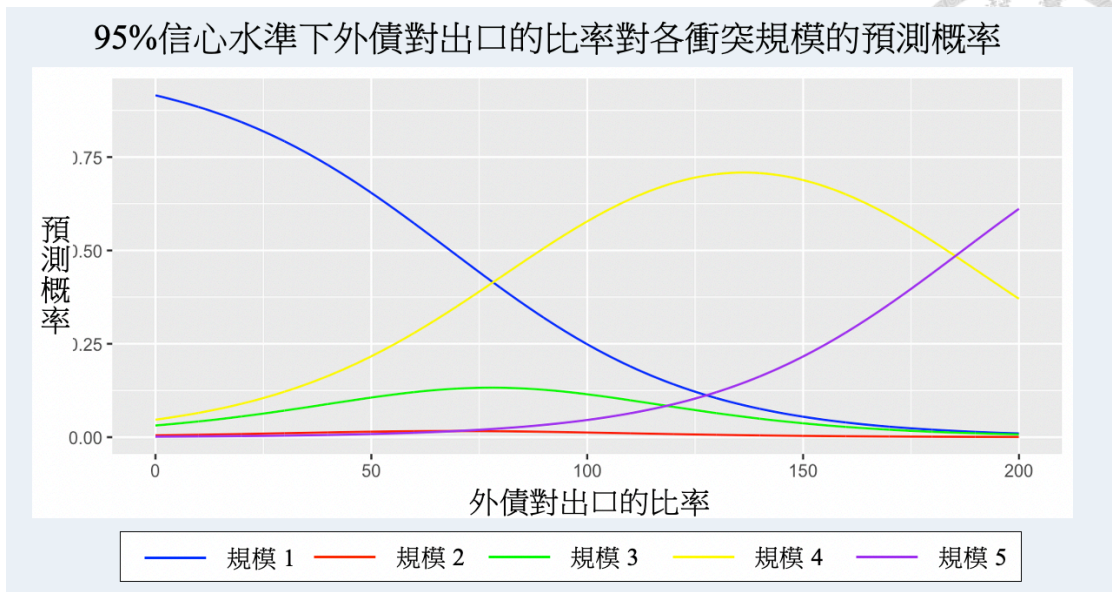


圖 4 - 11 「外債對出口的比率」對各衝突規模的預測概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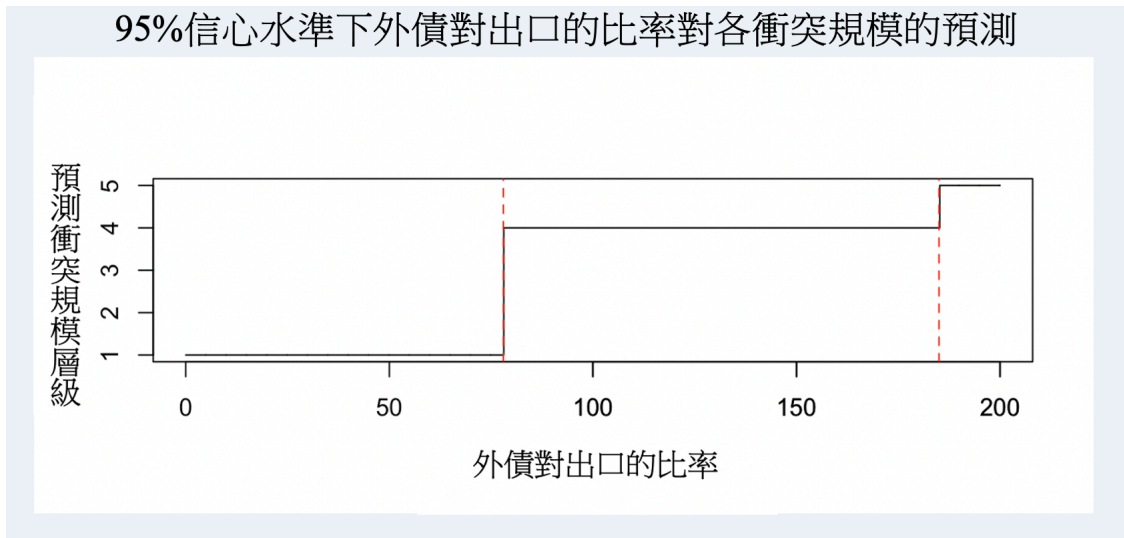


圖 4 - 12 「外債對出口的比率」對各衝突規模的預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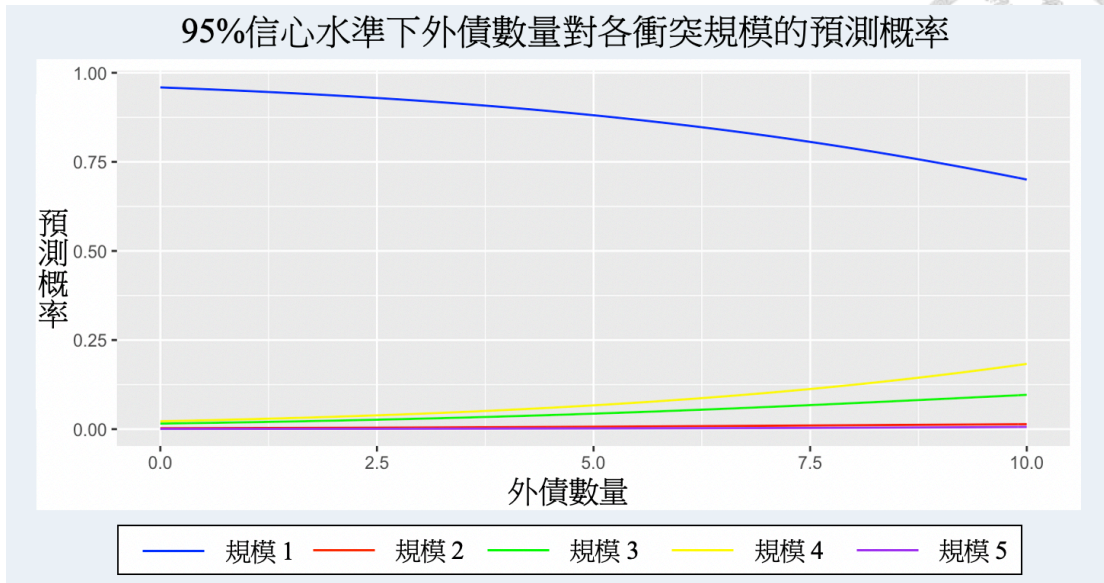


圖 4 - 13 「外債數量」對各衝突規模的預測概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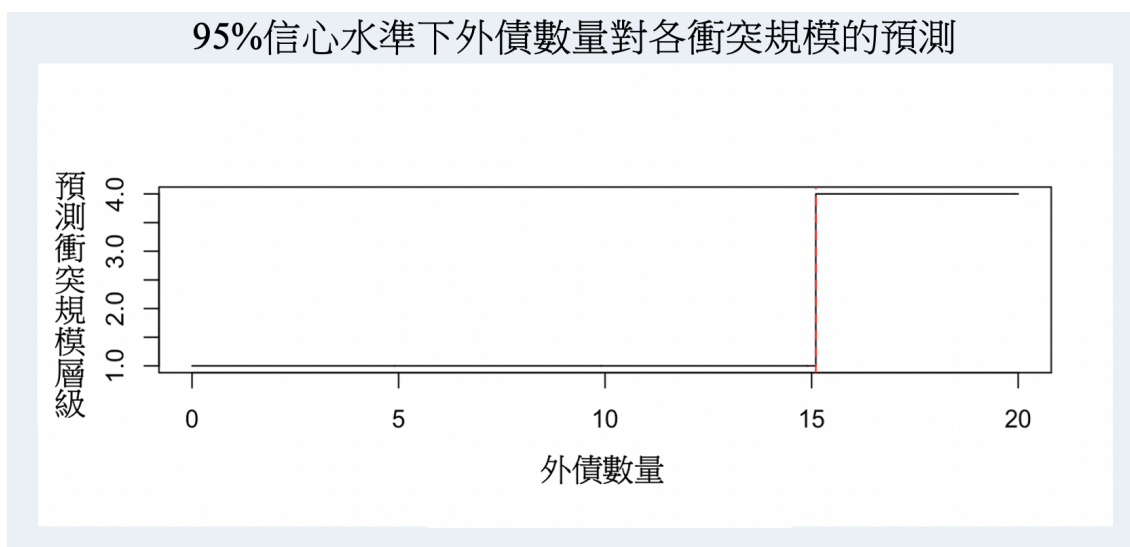


圖 4 - 14 「外債數量」對各衝突規模的預測




### 第三節 小結

本研究透過不同外債的測量指標進行相關統計測量，迴歸分析的結果揭示了一個國家的外債負擔與外債大小確實能對衝突的發動有正向的影響，越多的外債，會增加越多衝突發生的機會，這兩者之間有統計上的顯著相關性。再來，本研究亦發現國家的外債負擔大小與國家發動衝突的規模大小也有相關性，而且為正相關，這意味著當國家外債越多，越有可能引領國家發動更高層級的衝突。

然而，若將兩者的迴歸結果與敘述統計相互參照，可以發現即便將樣本中全體國家外債的平均值帶入外債大小對衝突的預測概率中，衝突的爆發機率相當小，不到 10%，但還是有衝突發生的可能性。隨著外債的提高，樣本中外債負擔最重的國家巴哈馬（外債對 GDP 的比率為 61），其衝突的可能性在預測概率中，則會超過 80%，且在衝突規模中，有接近 74%的機率位於規模 4 的位置。

進一步推論，當一國外債的負擔與大小是普通水準時，國家雖然有發動衝突的機率，但機率不大。而是當一國的外債負擔與大小上升到某一水準時，而該水準可能是接近甚至超過該國的外債不可負擔水準時，衝突發生的機率就大幅提高。

本章的分析結果呼應到本研究提出的「債務衝突假說」。揭示了當一債務國身負大量外債時，雖然面臨還債壓力，同時可能也影響到自身的經濟狀況，但由於那些外債仍處於自身可以忍受的範圍內，所以該國試圖與債權國或是國際金融組織進行新的債務融資或是債務減免的談判。此時，債務國處於劣勢的談判地位，因為第一，債權國鮮少會願意放棄自身的債權利益，同時還會審慎評估該債務國的借貸信用條件來決定是否給予債權國相關債務優惠；第二，債務國會避免陷入衝突或戰爭中，避免其中帶來的不確定代價更惡化國家的經濟，提升了還債的成本。



然而，這種和平的局勢可能會隨著債務的提高而被打破。一旦債務國的外債超過不可持續的門檻，讓其認為處理外債的成本高於衝突成本時，債務國就會變得更好戰，有極高的誘因對外發動衝突，而且可能是依照不同的債務壓力，對外採取不同規模的衝突行為。債務國的這種對外衝突手段，目的並不是要取得衝突的勝利，而是使自身處於極大風險的情況下，透過衝突這種博弈的方式，孤注一擲向債權國或是國際金融組織傳遞訊號，來增加自身進行債務談判的優勢，解決和平時期棘手且昂貴的債務問題。債務國發動衝突能為弱勢的處境創造一絲機會，「外債」可能讓國家變得更好戰，成為國家進行衝突行為的誘因，「外債負擔的大小」則可能成為升高衝突規模的助力。

## 第五章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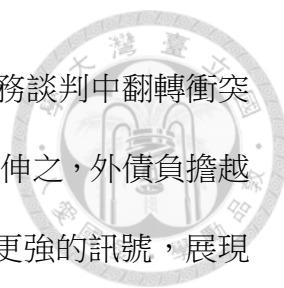


###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理論貢獻

#### 壹、 研究發現

在國際政治領域的衝突研究中，從國際結構層面、制度層面或是個人層面來探討國家對外衝突行為的文章可說是不勝枚舉。然而，從國際政治經濟的視角來研究外債對國家衝突行為的影響的相關著作卻是乏善可陳。歷史上的三個案例—阿根廷的福克蘭群島戰爭、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與納粹德國的侵略行動均告訴我們，國家是有可能因為外債而對外發動衝突。本研究想要解析一個國家的外債大小與其對外衝突行為，以及戰爭行為，是否存在相關性，以及外債大小與衝突規模的上升是否也存在相關性。

為了驗證這些問題，本研究先是提出一個債務衝突假說，解釋債務國為什麼會因為外債而對外發動衝突，來作為連結債務國外債與軍事衝突之間的機制。這個假說以高成本和平的債務融資模型與和平鴿子假說為理論基礎。若一個國家負擔過多外債（以下稱債務國），這些外債造成的諸多問題使債務國迫切需要與債權國或國際金融組織進行外債談判。然而根據現實面，這些談判並不會這麼順利，而且對債務國來說相當不利，因此會使債務國認為維持現狀的和平是高成本的，唯有透過對外衝突的手段，向外一搏，向債主以及其餘潛在借貸者釋放出訊號，來提升自身在債務談判中的機會。然而，普遍深受債務困擾的債務國如何有能力與本錢對外衝突呢？和平鴿子假說認為弱小國家無論如何都難以取勝，唯有先發動攻擊，冒險相




信對手不願深陷戰場，保有第一擊優勢，債務國才能在隨後的債務談判中翻轉衝突前極為弱小的議價能力，最終解決外債衍生的各種問題。由此延伸之，外債負擔越重的國家會希望提高對外衝突規模向債主或國際金融組織傳遞更強的訊號，展現其迫切需要讓步的決心，增加談判槓桿，得到更多債權國或國際金融團體的援助。

在針對外債與衝突之間的連結機制進行假設後，本研究透過對 192 個國家進行從 1970 年到 2014 年共橫跨 45 年的實證研究，以不同衡量外債可持續性的指標，包含外債對 GDP 的比率、外債對出口的比率與外債數量，來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結果發現，無論使用哪種指標，外債負擔與外債數量的增加，皆會提高債務國對外發動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外債會使一個國家更加好戰。而且外債數量對不同收入程度的國家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像是中等收入偏下的國家在面臨高負債時會比同樣面對一樣高負債數量的全體國家還要更有機會對外發動衝突。另外，三種指標皆指出，當外債負擔或外債數量的增加，會讓債務國更有可能發起更大規模層級的軍事衝突。但規模升級可能性的效果卻在衝突規模 1（無使用武力）、3（展示武力）、4（使用武力）與 5（戰爭）較為明顯，衝突規模 2（威脅使用武力）則不明顯。

## 貳、 理論貢獻

在本研究中，試圖提出一個債務衝突假說，從債務國與他們的債權國或是國際金融組織的互動，來說清楚國家的外債負擔與他們衝突行為之間的相關機制。為了建立這個機制，本研究先是透過對總體經濟學的爬梳，釐清外債負擔會對債務國造成什麼樣的經濟與政治影響，國家能透過什麼方法解決外債問題，而不是直接違約。我們知道，債務國解決債務問題有許多種辦法，但通常都伴隨著嚴苛的條件與



經濟風險。再透過對於國家外債相關文獻的整理，歸納債務國會因為外債做出什麼樣的行為，以及他們背後的動機。而債權國的角色也非常重要，主要討論債務國時，無法忽略債權國與債務國之間的互動，因為債權國除了會關注債務國任何解決債務的辦法，也會反過來透過債務對債務國進行政治施壓。另外，外債與衝突行為也有很緊密的關係，國家會因為衝突而累積外債，反過來國家也會因為外債而陷入衝突。例如債務國在與他國衝突時，需要透過借債來融資，增加動員能力與獲勝機會；債務國會因為債務不可持續問題等財政問題陷入內戰或是國際衝突。因此，唯有確認清楚債務國與債權國的互動關係與債務國的行為意義，才能真正了解債務國對外發動衝突的真實意涵。

再者，本研究與以往的債務衝突研究不同，嘗試將公共債務的內債與外債區隔開來，把債務義務的歸屬劃分清楚。不但納入和平鴿子假說，考量債務國的國家實力，為債務負擔大的弱小國家提供好戰的解釋。同時將軍事衝突行為做規模的劃分，為債務國的對外衝突行為進行更細緻的分析。並且在實證上，根據資料取得的可行性，盡力涵括所有樣本，希冀強化衝突研究中關於債務的一般性理論建立，為國家衝突的行為提出一個可能解釋。

最重要的是，本研究設定的三個假設，透過三種不同外債測量的指標，檢視衝突發生的可能性以及不同衝突規模的概率預測等，皆說明了外債負擔是國家對外衝突行為的考量之一，也呈現了外債負擔一但逾越了其可負擔的水準，將會大大提升該債務國發動衝突的可能與衝突規模提升的可能，暗示該國將會採取好戰的態度，可以說對未來對於對手國是否好戰增加了一個評判的可能指標。

##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儘管力求在研究設計與方法上能嚴謹並符合科學的要求，本研究在理論與方法上仍有若干不完備之處。

首先，因為外債資料取得的限制，即使衝突資料完整，本研究無法觀察更長時間範圍的外債與衝突之間的關係，而且有許多國家的外債資料、GDP 資料或是出口資料不完整，導致會有許多遺漏值出現。第二個問題則源自於債務負擔的定義，即使本研究已經透過一國的 GDP 與出口來衡量其對外債的償還能力，還是有少數高收入國家無法真實反映出他們是否處於高外債負擔的處境。因為這些國家有良好的信貸能力，就算外債負擔指標顯示的數值很高，他們還是可以持續借債，使他們實際感受到的債務負擔不如帳面數值的重。例如盧森堡的外債數量平均都超過 GDP 高達 13 倍，甚至在 2010 年後皆超過 25 倍，但他們的信用評等根據標準普爾 (Standard & Poors) 這間世界性權威金融分析機構，卻是歷年來皆評等為 AAA 最高級 (Trading Economics, 2022)，意即即使盧森堡的外債累積相當高，但由於其信用良好，可以輕易的向他國進行融資。

最後，關於本研究的重要變項——債務——也有值得斟酌的地方，從債務負擔的角度來看，本研究已經對內外債的負擔做了初步的劃分，認為內債相較於外債來說，對於國家債務負擔的影響沒有這麼大，因為國家有更多的手段能夠處理內債問題。即便如此，Reinhart & Rogoff(2011)曾指出，雖然內債缺乏完整的長時間跨國內債資料，甚至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資料也僅能追溯至 1980 年，又長期不被學界重視，但內債是佔據國家的所有債務中，外債以外的所有債務，且對國家的經濟層面上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效果，所以不能輕易的忽視。因此，相關內債與衝突的討論，有待其他研究者做進一步的討論。

# 參考文獻



## 壹、 中文部分

張寶宇，1994，《拉丁美洲外債簡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陳芝芸，2007，《拉丁美洲對外經濟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賴競民，2008，〈拉美國家債務史與地區不平等發展之研究—以墨西哥、巴西與阿根廷為例〉，《北市教大社教學報》，7:125-156。

## 貳、 英文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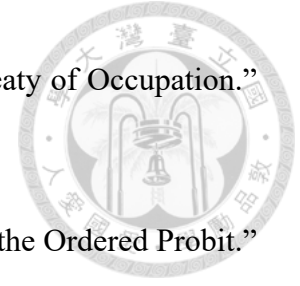
Agénor, P. R. and J. Aizenman. 2005. "Financial sector inefficiencies and the debt Laffer cur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 Economics* 10 (1): 1-13.

Aizenman, Joshua. 2004. "Financial Opening and Development: Evidence and Policy Controvers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2):65-70.

Ali, R. and U. Mustafa. 2012. "External Debt Accumulation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in Pakistan." *The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51(4):79-95.

Alvarez-Plata, Patricia. 2012. "External Debt in Post-Conflict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36(3):485-504.

Arnone, M., Bandiera, L., & Presbitero, A. F. 2005. "External Debt Sustainability: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nternational Finance* 33:1-47.



Bauduy, J. 2015. "The 1915 US Invasion of Haiti: Examining a Treaty of Occupation."

*Social Education* 79(5):244-249

Becker, W. E. and P. E. Kennedy. 1992. "A Graphical Exposition of the Ordered Probit."

*Econometric Theory* 8(1):127–131.

Blainey, Geoffrey. 1988. *Causes of war*. New York: Free Press.

Bremer, S. A. 1992. "Dangerous dyads: Conditions affecting the likelihood of interstate war, 1816-1965."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6(2):309-341.

Britannica, T. Editors of Encyclopaedia 2021. "Treaty of Versailles."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Treaty-of-Versailles-1919>. Latest update 13 August 2021.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David Lalman. 1992. *War and Reas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mperat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ulow, J., Rogoff, K., & Dornbusch, R. 1988. "The buyback boondoggl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88(2):675-7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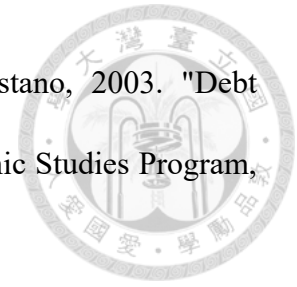
Bulow, J., Rogoff, K., & Dornbusch, R. 1988. "The buyback boondoggl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88(2):675-70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 "Decision of the Reparation Commission on the Subject of the Payments to be Made by Germany in 1922."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6(4):238–245.

Cameron, D. and K. Trivedi. 2006. *Microeconomics using stata*. Stata Press: Cambridge, UK.

Cappelen Å., Gleditsch NP., & Bjerkholt O. 1984. "Military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OECD Countri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1(4): 361-373.

Carmen M. Reinhart, Kenneth S. Rogoff and Miguel A. Savastano, 2003. "Debt Intoleranc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Economic Studies Program*,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34(1):1-74.



Carmignani, Fabrizio. 2013. "Debt and peace in post-conflict countries. Contributions to Conflict Management, Peace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20): 131-156.

Carrasco, E. R., C. McClellan. and J. Ro. 2007. "Foreign Debt: Forgiveness and Repudiation."

Carter, J., & Palmer, G. 2016. "Regime type and interstate war finance."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2(4): 695-719.

Chiminya, A., J.P. Dunne and E, Nikolaidou. 2018. "Military Spending, Conflict and External Debt in SSA". *Defense and Peace Economics* 30(4): 462-473.

Claessens, Stijn, Ishac Diwan, Kenneth A. Froot and Paul R. Krugman. 1991. *Market-Based Debt Reduct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Principles and Prospects*. 16th ed.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Claessens, Stijn. 1990. "The debt laffer curve: Some estimates." *World Development* 18(12):1671-1677.

Coe, A. J. 2012. *Economic origins of war and peace*.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Collier, P. 2006. "War and military spend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for development." *The Economics of Peace and Security Journal*: 1(1)

Copeland, D. C. 1996.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4):5-41.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2017. "State System Membership List, v2016." Online,  
<http://correlatesofwar.org>



D'Erasmus, P., & Mendoza, E. G. 2021. "History remembered: Optimal sovereign default on domestic and external deb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17:969-989.

De la Cruz, A. 1988. "A Case Study in Third World Debt: Argentina."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 22(3):643–667.

Di Casola, P., & Sichlimiris, Spyridon. 2017. "Domestic and external sovereign debt." *Riksbank Research Paper Series* 169.

DiGiuseppe, M. 2015. "The fiscal autonomy of deciders: Creditworthiness and conflict initiati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1(3):317-3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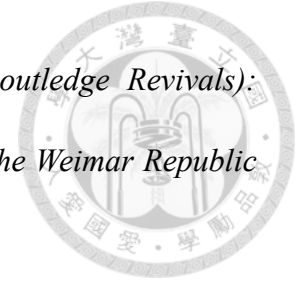
Dooley, M. P. 1988. "Buy-Backs and Market Valuation of External Debt." *IMF Staff Papers* 35(2):215–229.

Drezner, Daniel W. 2009. "Bad Debts: Assessing China's Financial Influence in Great Power Politics." *Quarterly Journ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4)2: 7-45.

Edward, Schumacher. 1982. "Argentina default is fear"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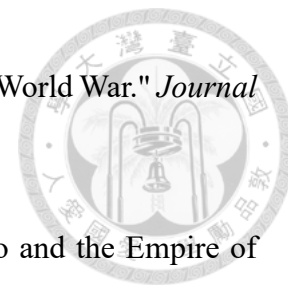
Edwards, Sebastian. 1990. "Capital Flow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ebt-Equity Swap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BER Working Papers 349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Elmendorf, D. and N. G. Mankiw. 1999. "Government Debt". In *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 ed. J. B. Taylor and M. Woodford. North Holland, 1615-1669.



- Evans, R. J., & Geary, D. 2015. *The German Unemployed (Routledge Revivals): Experiences and Consequences of Mass Unemployment from the Weimar Republic to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Fearon, J. 1995.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3):379-414.
- Ferguson, Niall. 2001. *The Cash Nexus: 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2000*. New York: Basic Books.
- Flores-Macías, G. A., & Kreps, S. E. 2017. "Borrowing Support for War: The Effect of War Finance on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1(5):997–1020.
- Garriga, A. C. 2021 "Central banks and civil war termina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 Gent, S. E. 2009. "Scapegoating strategically: Reselection, strategic interaction, and the diversionary theory of war."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35(1): 1-29.
- Goldmann, Matthias. 2012. "Sovereign debt crisis as threats to the peace: restructuring under chapter VII of the UN charter?" *Goetting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1): 5153-157.
- Goopu, Sudarshan. 1996. "The analysis of emerging policy issues in development finance."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1589
- Gruber, J. and S. Kamin. 2012. "Fiscal Positions and Government Bond Yields in OECD Countrie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44(8): 1563-1587.
- Guembel, A., & Sussman, O. 2009. "Sovereign debt without default penalti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6(4): 1297-1320.

Hall, George J. 2004. "Exchange rates and casualtie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1 (8):1711-42.



Hernández-Sáenz, L. M. 2018. "The French Intervention in Mexico and the Empire of Maximilian and Carlota." *In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Latin American History*.

Hintjens, Helen M. 1999. "Explaining the 1994 Genocide in Rwand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37(2): 241-286.

Hjertholm, P. 2000. *Analytical History of 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y (HIPC) Debt Sustainability Targets*. Institute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Holsti, Ole R., and Robert C. North. 1966. "Comparative data from content analysis: Perceptions of hostility and economic variables in the 1914 crisis." *In Comparing 104 nations : the use of quantitative data in cross-national research*, ed. R. L. Merritt and S. Rokkan.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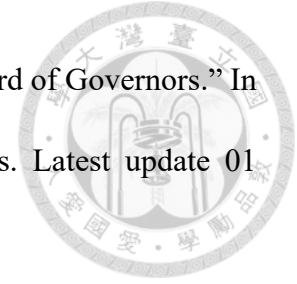
Hörngren, L., & Lindberg, H. 1993. *The struggle to turn the Swedish krona into a hard currency*. Sveriges riksbank.

Husain, Aasim M. 1993. "Debt relief schemes and welfa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12(6): 632-643.

Husain, Ishrat and Ishac Diwan. 1989. *Dealing with the Debt Crisi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IDA. and IMF. 1999. "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 (HIPC) Initi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Current Framework and Options for Change"

IDA. and IMF. 2001. "The Challenge of Maintaining Long-Term External Debt Sustainability." Washington, DC.



IMF, 2022. “IMF Members' Quotas and Voting Power, and IMF Board of Governors.” In <https://www.imf.org/en/About/executive-board/members-quotas>. Latest update 01 July 2022.

IMF. 2000. “Debt- and Reserve-Related Indicators of External Vulnerability.” *Policy Paper*.

IMF. 2001. “Modernizing the Framework for Fiscal Policy and Public Debt Sustainability Analysis,” *IMF Policy Paper*.

IMF. 2002. “Assessing Sustainability.” *IMF Policy Paper*.

IMF. 2003. “External Debt, Public Investment, and Growth in Low-Income Countries” *IMF Working Paper* 03/249.

IMF. 2021. “Debt Relief Under the 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 (HIPC) Initiative.” *Factsheet*. In

<https://www.imf.org/en/About/Factsheets/Sheets/2016/08/01/16/11/Debt-Relief-Under-the-Heavily-Indebted-Poor-Countries-Initiative>.

IMF. 2021. “Joint World Bank-IMF Debt Sustainability Framework for Low-Income Countries.” *Factsheet*. In

<https://www.imf.org/en/About/Factsheets/Sheets/2016/08/01/16/39/Debt-Sustainability-Framework-for-Low-Income-Countries>.

Jean-Claude Chouraqui, Brian Jones and Robert Bruce Montador, 1986. “Public Debt in a Medium-Term Contex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iscal Policy.”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30

Kemal, A. R. 2001. “Debt Accumul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Growth and Poverty.” *The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40(4):263–281.



Keynes, John Maynard.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Khan, Mohsin S. 2001. "IMF Conditionality and Country Ownership of Programs." *IMF Working Paper No. 2001/142*.

Kirshner, Jonathan. *Appeasing Bankers: Financial Caution on the Road to War*.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ohlscheen, E. 2010. "Domestic vs external sovereign debt servic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 Economics* 15(1):93-103.

Kraay, A., & Nehru, V. 2006. "When is external debt sustainable?"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3):341-365.

Krainin, C., K. Ramsay., B. Wang. and J. Ruggiero. 2021. "Preventive War and Sovereign Deb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Krugman, Paul. 1988a. "Financing vs. forgiving a debt overha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9(3):253-268.

Krugman, Paul. 1988b. "Market Based Debt-Reduction Schemes."

Lane, P.R., Milesi-Ferretti, G.M. 2018. "The External Wealth of Nations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MF Economic Review* 66:189-222.

Laurent, P. N. 2019. *The Land of Bullet Holes: Imperial Narrativ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Occupation of the Dominican Republic, 1916-1924*. Temple University.

Lee, K. Y. 2017. *Political Clout of Government Bondholders: How Government Bondholders Expect and Affect States' Conflictual Behaviors*.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Iowa.

Leeds, Brett Ashley et al. 2002.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1815-1944."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8:237-260.

Levy, J. S., & Vakili, L. I. 1992. *Diversionsary action by authoritarian regimes: Argentina in the Falklands/Malvinas case*. New York: Routledge.

Liao, T. F. 1994. *Interpreting probability models: Logit, probit, and other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Iowa City, IA: Sage Publication.

Maoz, Z. and Russett, B. 1993. "Normative and Structural Causes of Democratic Peace, 1946-1986."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87(3), 624–638.

McKelvey, R. D., & Zavoina, W. 1975. "A statistical model for the analysis of ordinal level dependent variables."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4(1):103-120.

Mitchell, N. 1996. "The Height of the German Challenge: The Venezuela Blockade, 1902–3." *Diplomatic History* 20(2):185–209.

Mitchener, K. J. and M. D. Weidenmier. 2010. "Supersanctions and sovereign debt repay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9(1):19-36.

Musayev, V. 2016. "Externalities in military spending and growth: The role of natural resources as a channel through conflict."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27(3): 378-391.

Oakes, A. 2006. "Diversionsary war and Argentina's invasion of the Falkland Islands." *Security Studies* 15(3): 431-463.

Oakes, Amy. 2012. *Diversionsary War: Domestic Unrest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California: Stanford Security Studies.





Oneal, J. R., & Russett, B. M. 1997. "The Classical Liberals Were Right: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1950-198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1(2), 267–293.

Palmer, Glenn, W. Roseanne, McManus, Vito D’Orazio, Michael R., Kenwick, Mikaela Karstens, Chase Bloch, Nick Dietrich, Kayla Kahn, Kellan Ritter and Michael J. Soules. 2020. "The MID5 Dataset, 2011-2014: Procedures, Coding Rules, and Description." Working paper.

Panizza, U. 2008. "Domestic and external public deb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188.

Pemstein, Daniel et al. 2022. "The V-Dem Measurement Model: Latent Variable Analysis for Cross-National and Cross-Temporal Expert-Coded Data". V-Dem Working Paper No. 21. 7th edition.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Varieties of Democracy Institute.

Plehn, R. 1989. "Securitization of third world debt."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 23(1):161.

Poast, P. 2015. "Central Banks at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9(1):63-95.

Reinhart, C. M., & Rogoff, K. S. 2011. "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domestic debt." *The Economic Journal* 121(552):319-350.

Reinhart, C. M., & Sbrancia, M. B. 2015. "The liquidation of government debt." *Economic Policy* 30(82):291-333.

Reinhart, C. M., Kenneth S. Rogoff and Miguel A. Savastano, 2003. "Debt Intoleranc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Economic Studies Program,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34(1):1-74.

Rigobon, Roberto, and Brian Sack. 2005. "The effects of war risk on US financial market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9 (7):1769-89.

Ritschl, A. 2013. "Reparations, deficits and debt default: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Germany."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Lessons for today* 110-39.

Robert Powell. 2002. "Bargaining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5(1):1-30.

Rodriguez, Carlos Alfredo. 1988. "The Strategy of Debt Buyback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etitive Case." *IMF Working Paper* 88/20.

Roubini, N. 2001. "Debt Sustainability: How to Assess Whether a Country is Insolvent."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New York University.

Sachs, Jeffrey. 1989. *The Debt Overhang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Debt, Stab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Essays in Memory of Carlos F. Diaz-Alejandro*, ed. By Ronald Findlay. Oxford: Blackwell.

Schultz, K. and B. Weingast. 2003. "The Democratic Advantag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Financia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7(1):3-42.

Setser, Brad W. 2008. *Sovereign Wealth and Sovereign Power: The Strategic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Indebtednes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Shea, P. E. 2016. "Borrowing trouble: Sovereign credit, military regimes, an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42(3):401-428.

Shea, P. E. 2020. "Money Talks: Finance, War, and Great Power Politic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ocial Science History* 44(2):223-249.

Shea, P. E., and P. Poast. 2018. "War and Defaul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2(9): 1876–1904.

Singer, J. David, Stuart Bremer, and John Stuckey. 1972. "Capability Distribution, Uncertainty, and Major Power War, 1820-1965." *Peace, War, and Numbers* 19-48.

Singer, J. David. 1987. "Reconstructing the Correlates of War Dataset on Material Capabilities of States, 1816-1985."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14:115-32.

Stiles Kendall W. 1987. "Argentina's Bargaining with the IMF."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29(3): 55-85.

Tarar, A. 2006. "Diversionary incentives and the bargaining approach to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0(1):169-188.

Tatu, Ștefania. 2014. "An application of debt Laffer curv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Romania's case." *Romanian Journal of Fiscal Policy* 5(1):29-38

Tomz, M. and M. L. J. Wright. 2013. "Empirical Research on Sovereign Debt and Default."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5:247-272.

Trading Economics. 2022. "Luxemburg – Credit Rating." in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luxembourg/rating>. Latest update 3 March 2022.

Trueman, C. N. 2015. "Weimar Republic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historylearningsite.co.uk. The History Learning Site. in <https://www.historylearningsite.co.uk/modern-world-history-1918-to-1980/weimar-germany/weimar-republic-and-the-great-depression/>. Latest update 4 April 2022.

Waltz, K. N. 195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aveland Press.

Wignaraja, G., D. Panditaratne., P. Kannangara. and D. Hundlani. 2020. “Chinese investment and the BRI in Sri Lanka.”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Woo, J. and M. S. Kumar. 2015. “Public Debt and Growth”. *Economica* 82(328): 705-739.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21. “GDP growth(annual%), Export.”

Retrieved from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

World Bank. 2014.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4.” The World Bank.

Zielinski, R. 2016. *How States Pay for Wars*.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